

内部学习资料

仅供参考 严禁外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中国经济 压力与潜力

北大承泽

参考

2024年5月

制作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制作部门：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目录

中国经济压力与潜力

热点分析

01

林毅夫：中国经济的压力、潜力与定力.....	04
卢锋：新一轮产能过剩特点及对外影响.....	23
徐高：中国经济的上中下三策，要避免滑入下策的不利局面.....	40
罗志恒：中国财政的家底与未来.....	73
林毅夫 + 徐高 + 罗志恒 + 卢锋：中国经济的压力与动力.....	92

产业观察

121

黄益平：中国经济的新阶段与数字经济的新征程 ..	123
安筱鹏：AI 大模型重构产业竞争力的五种模式...	141

张月强：数智化如何重新定义企业创新？159

管理课堂

173

宫玉振：企业家应该保持一种适度悲观的
乐观主义.....175

侯宏：战略是关于做强的学问.....192

承泽精选

202

黄卓、周鼎：加快发展人工智能 实现生产力跃升..204

李力行：中国的城市化还能走多远？211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30th
Anniversary
2024

01.

热点分析

编者按：

2024 年，中国经济面临什么样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主要压力是什么？潜力如何评估？哪些是中国经济的新动能？新动能与传统动能、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政府与市场如何协同发力？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北大国发院“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 68 期上，多位学者从各自的专业研究领域出发，分享和研讨中国经济的压力与动力，并启动北大国发院 30 周年庆。



本期“热点分析”栏目包含五篇文章，首先是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结合最新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对中国经济当前诸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做的梳理。

第二篇是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卢锋对新一轮产能过剩的成因、影响和应对之策做了缜密分析。

中银证券总裁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兼职教授徐高老师对于我国中长期的分析框架做了完整报告。他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上中下三策，当务之急是避免下策，力争上策，确保中策。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讲解了我国财政的真实情况，未来可用空间，以及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而应有的改革方向。



本栏目最后一篇文章是以上四位专家在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王贤青的主持下进行的问答和对话。

林毅夫：中国经济的压力、潜力与定力

卢锋：新一轮产能过剩特点及对外影响

徐高：中国经济的上中下三策，要避免滑入下策的不利局面

罗志恒：中国财政的家底与未来

林毅夫 + 徐高 + 罗志恒 + 卢锋：两会解读之中国经济的压力与动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林毅夫¹：中国经济的压力、潜力与定力

今年对国家发展研究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我们正好成立 30 周年，30 年前成立时名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8 年改名国家发展研究院。我们立下的宗旨是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同时也作为智库提供政策咨询。30 年来，国家发展研究院能够取得成绩，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主要是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更重要的则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当年我们这群有家国情怀的年轻人之所以要在北大成立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希望能

1. 林毅夫：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

贡献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建国之初，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从 1978 年年底到 2023 年，这 45 年里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8.9%。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任何一个国家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跟 1978 年比，我们的经济规模增加了 47 倍，这是一个奇迹。在这样的奇迹之下，我们应该很快能够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现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人均 GDP13845 美元，而中国现在的人均 GDP 已经接近 13000 美元，我估计，快则到 2025 年，慢则到 2026 年，我们应该可以跨过这个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很重要的里程碑。

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

的奇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最近，这种“中国经济快不行了”“中国经济会崩溃”“中国经济可能永远赶不上美国”之类的说法再度盛行。我想谈谈：为什么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能够取得经济增长奇迹？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奇迹，为什么“中国崩溃论”多年盛行？最后再对今年的发展前景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取得奇迹般增长？

中国经济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能够取得如此快速的增长？原因在于我们改革的目的和方略。

改革之始，我们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人均GDP不及非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一。此前，我们推行的是以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使得中国得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重工业

体系，让我们能够在 1960 年代试爆原子弹，1970 年代卫星上天，有了坚强的国防，能够独立自主地推行我们的政策，为民族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国有企业效率低，致使人均收入水平很低。

众所周知，我们之所以要追求民族复兴，既是希望国强，也希望民富。但在 1978 年之前，人民极端贫穷。为在国强的同时提速民富，中国从 1978 年底开始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成为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基本上所有发展中国家当中率先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并且，我们在过去 45 年中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

转型以后，我们为什么能够取得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这得益于我们当时改革中推行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念，采取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方法，也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当时，有很多大型重型的、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低效问题。基于我这些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这些企业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的市场当中没有自生能力。虽然它们低效且无自生能力，但我们改革之时采用“老人老办法”，继续由国家提供必要的补贴保护来维持其生存，维护了经济的稳定。

同时，对一些原先受抑制但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我们采取“新人新办法”。政府允许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进入这些符合比较优势的新产业，而且不仅允许这些企业进入，政府还积极地因势利导，帮助其发展。比如，当时我们的基础设施很差，不可能在全国同时改进基础设施，但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有好的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就先设立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区，在园区里把基础设施建好。当时，为保护国有企业，

政府还对经济有很多干预、扭曲，但在这些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区里实行一站式服务，硬环境和软环境同时改善。

同时，我们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需要进入国际市场，但当时国内的企业能力不足，我们就招商引资。外资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而且带来了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如此，这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得以快速发展，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还可以利用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所形成的后来者优势，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比自己发明的成本低、风险小。

综上，我们通过“新人新办法”，使很多产业获得快速发展，不仅创造了就业，而且能积累资本、外汇，使我们的产业从劳动力密集型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升级，如此进入正循环，产业不断升级迭代。原来很多国企早年违反比较优势，后来中国自身产业结构和市场生态的变迁而逐步符

合比较优势，这些企业也因之具备了自生能力，不再依赖补贴保护来生存。政府干预补贴的需要渐小，甚至可以完全退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逐步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经济也多年得以保持稳定且快速地发展。

“中国崩溃论”为什么此起彼伏？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奇迹当前，“中国崩溃论”还会经常出现？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周期性波动。投资经常会有潮涌，一段时间新的产业出现，投资一起涌进去，即使那个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但由于一下子投入太多，也会造成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以后，这些企业的经营绩效就会不好，投资能力和意愿就会降低，经济发展就会减慢。

比如，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乡镇企业都一拥而上，去投资

当时的热门产业。比如家电产业，几百个企业涌入，几百条生产线同时上，因此导致产能过剩。在这种状况下，经济需要调整，投资减少，增速下降。

经济发展过程中还会遇到外部冲击，比如 1998 年东亚金融危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出口增长非常快，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当国际经济下滑时，我们的出口产业就会受到很大冲击，经济增长也会因之变慢。

由于我们采取的是渐进式双轨制改革，经济当中存在政府干预，存在一些所谓“局部扭曲”。在这种状况之下，当中国经济下滑时，经常就会被认为是中国自己的结构性问题所致。

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有个很有趣的对比：美国经济增长放慢时，通常会把

原因归咎于其他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是归咎于日本，现在归咎于中国；而当中国经济增长放慢时，国际学界普遍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国自身的体制机制问题。不仅国外学界如此判断，国内学界一般也会如此。

中国确实存在由渐进双轨改革不到位而导致的各种问题，但经济下滑很多时候可能是外部因素或周期性因素所致。而国内国际往往倾向于认为是中国自己的体制问题造成的，同时由于体制机制问题不易改或不能改、不愿意改，大家由此就对中国经济产生悲观情绪，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崩溃在即。

2013 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从原来的 9%、10%，一路下滑到 6%、5%。这是事实，但对于这种持续下滑，国际国内的说法很多。

很多人认为，这是“国进民退”所致。从产权理论来看，一般认为国有企业没有效率，民营企业有效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基本上 100% 是国有企业，现在国有企业的占比只有 25%-30%，民营企业从原来基本没有，到现在占到 70%-75%。在这种状况下，过去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增长快是因为产权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有不少理论文章也证明这种说法。

但是，从 2003 年以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中的比重也升高，民营企业在这两方面的比重则同步下降。很多人认为，民营企业比重下降是因为受到政策压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个问题基本无解，因为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是国家的政策，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效率就会下降，因此将经济不断下滑归咎于政策。

如果持这种看法，就容易产生悲观预

期，对于未来发展失去信心。

从统计数字来看，国有企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和在贷款中的比重确实有所上升。但问题是，“经济增长下滑”、“国有企业比重上升”、“贷款给国有企业的比重上升”，这些现象同时存在，但何者为因？何者为果？是国有企业占比上升导致经济增速放慢还是经济增长放慢导致国有企业占比上升？如果这个因果关系理不清，采取的政策就会不同，对未来的判断也不同。

在我看来，国有企业占比上升和国有企业贷款比重上升，都是经济增长放慢之果，而不是原因。民营企业的投资少及民营企业贷款比重下滑，是受到外部冲击，整个经济增长放慢所导致。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实际上一一直未能全面恢复。OECD 高收入国家在 1980-2008 年间的经济增

速平均每年是 2.7%，美国则是 3%。但 2008 年以后，这些发达国家并没有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增长速度都是明显下滑。美国算是在发达国家当中恢复最好的，2008-2022 年间也不过只有 1.8% 的年均增长，OECD 国家的年均增长只有 1.5%。

同时，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也没有全面恢复。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2008 年以后，世界经济增长下滑，贸易增长速度下滑得更多。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出口主要在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也就是“新人新办法”的部分，主要是民营企业。现在世界贸易增长下滑，导致我们出口增长下滑的幅度高。从 1978 年 -2008 年那 30 年，我们每年的出口增长达到 18%。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由于国际贸易下滑，发达国家增长慢导致进口需求低，我们的出口

就慢，增长率从原来将近 20%，下降到现在只有 5% 左右。

在这种状况下，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出口部门，也就是民营企业的部门。2008 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出口增长突然下滑，就造成民营企业产能过剩，而且发达国家的恢复还遥遥无期，甚至还在下滑。在这种状况下，民营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就会很差，当然就不愿意投资，因而获得的银行贷款就少。

这些现在占主要的、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其产能过剩，经营状况不好，不投资，这就给就业带来了影响。就业受影响，收入增长就随之受影响，所以家庭的消费增长就会受影响，整个经济也会下滑。

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当然必须采取一些逆周期的投资，以稳定经济。最明显的例子是 2008 年，我们采取“4 万亿”的

积极财政政策，做了不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一直没有复苏，以基础设施作为逆周期的措施也一直没有停下来。2008年，我们的高速公路是6万公里，2012年达到9万公里，2022年已经增加到17.7万公里，都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建设成果。2008年，我们的高速铁路只有1000多公里，现在已经超过45000公里，占到全世界的70%以上。另外，4G铺设、5G铺设等，基本上都是因为全球经济下滑所导致的出口减少，民营企业投资受到抑制，政府为稳定增长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果。

这些项目都是大型的、具有外部性的基础设施，所以是由国有企业来做，国有企业的比重因此逆周期上升。国有企业做这些项目，当然要跟银行贷款，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也跟着增长。这些基本上都是因为经济下滑，民营企业受到不利影响，

为了稳定经济增长所做的措施。

政府如果不做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民营企业的比重看起来会高一点，但日子会比现在更难过。原因在于，做这些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等材料，都是民营企业为主的部门所生产，可以给民营企业创造需求。而且，由于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了就会创造就业，就业就会稳定家庭就业和收入，家庭消费就会增加，家庭的消费所购买的日常用品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生产的。因此，政府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使国有企业的比重和国有企业在银行当中的贷款增加，但也给民营企业创造了需求、机会，有利于民营企业的稳定和发展。

如果对中国经济下滑和相应的因果关系没有准确的认识，容易产生悲观的看法。现在大家对中国经济没信心，对中国未来也相当悲观，实际上主要源于对于当前的

挑战没有正确的认识，以果为因。

2024 年中国经济展望

从上述角度看，2024 年中国经济到底会如何？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4 年，美国的增长率为 2.1%，相比 2023 年的 2.5% 下滑；日本的增长率为 0.9%，2023 年是 1.9%；欧元国家 2024 年只有 0.9%，固然比 2023 年的 0.5% 好一点，但与其长期增长 3% 左右来比，仍低 2 个百分点。所以今年我们的外部环境，除了地缘政治带来的挑战之外，出口环境仍不会好。

出口环境不好，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部门，其投资意愿会受到抑制。投资不振，就业会受抑制，家庭的收入预期随之也不会好，

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应该都会相对较慢。

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要想保持未来发展的信心，需要有合理的增长速度，政府的对冲投资就不可或缺。同时，也要恢复民营企业的信心。要恢复民营企业的信心，除了对外部的下滑压力要采取必要的对冲之外，非常有必要把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搞清楚。如前所述，近10年来，中国经济的节节下滑并不是现在海外盛行的“国进民退”所导致，经济下滑与国进民退之间的因果关系刚好相反，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一点。否则，大家容易对政府的政策倾向有误解，认为是政府在有意推进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有歧视。中国的政策仍然是“两个毫不动摇”，要毫不动摇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同时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如今，发改委还专门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来落实我们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支持民营企业的

进一步发展。这对恢复民营企业的信心有帮助。

除了采取了必要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灵活适度货币政策外，还要认识到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经济方面有人多人才多的优势，有大国市场的优势，还有产业配套齐全的优势，这方面有很大的技术创新的空间，可以大有作为。另外，我们有 85% 的产业还属于传统产业，具备后来者优势，并且，我们有非常好的通信基础设施，很好的数字经济基础，这些传统产业不仅可以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还可以进行数字化改造，所以产业技术改造和升级的空间非常大。民营企业在这些领域可以大有作为，政府需要采取必要的改革来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并给予必要的财政、金融支持。

只要对当前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外部需求的疲软有清晰的认识，采

取必要的缓冲措施，并进行必要的改革调动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积极性，我认为，中国仍能维持 5% 甚至更高的增长，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和定力。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占到全世界的将近 19%，5% 的增长可以为世界的增长贡献 1 个百分点，会占到全世界增长的 30% 左右，中国仍将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也是机会最多的国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卢锋²：新一轮产能过剩特点及对外影响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充分肯定 2023 年经济发展成就同时也指出多方面现实困难，包括“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2023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形势研判也用过类似表述，可见高层对这两方面问题的重视。

产能过剩不是新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经济随着转型深化就曾面临较大范围产能过剩；从新世纪初年到“三去一降一补”十多年中，某些部门产能过剩问题间歇性发生挥之不去，有关部门采用不同方法对其进行治理。

2. 卢锋：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

然而老问题有新内涵：目前产能过剩在行业分布和成因机制方面具有一系列新特点，另外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提升，国内产能过剩与跨国性全球性过剩相互交织。尤其在当前大国竞争和地缘经济关系深度演变背景下，国内产能过剩与外部经贸环境的互动关系已经并会进一步表现出来，从而派生一系列新的矛盾与问题。对新一轮产能过剩我们需调整视角分析应对。

新一轮产能过剩的行业观察

“产能过剩”指特定行业现有生产能力相对需求和合理产量水平过高。每一个行业都可能产能过剩，然而通常我们讨论的产能过剩主要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为对象：这些部门最初设计生产系统时会对产能有技术性界定，比较容易与现实需求和产量水平比较，从而便于量化评估这些行

业的产能是否过剩。由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可贸易程度较高，大国产能过剩可能通过贸易平衡变化对外部经贸环境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内外互动关系。

哪些部门存在产能过剩？对此《政府工作报告》等高层文告并没有明确提及。研究问题第一步是要厘清事实，然而准确判定产能过剩行业并不容易。下面通过搜集和观察行业数据、业内人士分析和媒体相关报道，侧重对几个部门产能过剩压力或风险进行初步观察讨论。

一是石化基础原料如乙烯。过去我国在这些行业发展相对滞后，由于我国制造业体系发达对石化原料需求较大，因而传统进口依存度比较高。一段时期以来特别是“十三五”期间大化工投资项目密集上马，近年供给快速扩张明显超过需求增长，显著改变供求关系并有望出现产能过剩压力。另外从全球看该领域也开始出现产能过剩

征兆和风险。

二是汽车业尤其是传统燃油车供大于求。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汽车行业高速发展，然而几年前产能扩张明显超过需求增长，尤其是传统燃油车在绿色转型背景下面临新能源爆发式增长的需求替代，面临较大产能过剩压力。近年汽车业整体产能利用率处于低位，汽车销售价格间歇性下调，从不同侧面反映产能过剩压力。

三是动力电池业。目前我国动力电池技术和产业化处于全球先进水平，全球前十大动力电池企业中，有六家来自中国，成为我国在前沿产业全球领先的典型案例。然而快速发展也积累形成产能过剩压力，据报道该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五成，近来价格回落以及营收和利润增速下滑。

四是部分成熟和传统芯片。芯片设计和制造技术复杂度高，是当代前沿技术产

业的代表性部门，目前 AI 普及有望接续推动芯片行业持续发展，尤其是高端芯片需求饱满甚至存在紧缺。不过非高端芯片业开始面临供给过剩压力。2023 年年底《中国电子报》有报道指出，2021 年的全球芯片紧缺刺激了前所未有的投资，导致后续几年芯片需求增长赶不上产能增长出现过剩压力。成熟制程晶圆代工厂甚至已经到了 60% 产能利用率保卫战的时刻。

五是新能源汽车。对新能源汽车产能是否面临过剩风险业界有不同见解，主流看法认为该行业处在发展机遇期谈不上过剩。然而即便官方人士也注意到新能源汽车行业存在无序竞争、部分地方盲目上马和重复建设等问题，从过去经验看这类现象可能成为供给过剩的前奏。考虑到产能扩张速度高于需求增长，不乏业内人士呼吁要重视产能过剩风险。近来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与销售价格显著回落，提示这个

新兴行业也需要关注供过于求风险。

需要指出，芯片、新能源车、动力电池等需求仍在较快增长，尤其是新能源车及核心零部件电池属于技术前沿新兴产业，其需求增长受到对燃油车存量替代特殊优势的加持，未来成长潜力更为可观。识别这类行业供给能力是否过剩需考虑上述特点并更加审慎。例如其价格下降可能是早期创新垄断定价随产能释放规模效应而走低，或由于市场竞争度提升而回落；另外其技术流程高频迭代或伴随某些原有产能退出，对定义合理产能利用率也会带来影响。不过即便对新兴行业，如产能扩张持续高于需求，仍不排除发生成长性行业过剩风险。

另外其它传统工业部门也不乏产能过剩问题。如钢铁、家电等行业多年存在的产能过剩并未消失，只是这些行业高速发展阶段已过与市场格局大体稳定，即便存

在过剩压力也不再引起广泛关注讨论。光伏、多晶硅等行业早先也曾遭遇产能过剩冲击，后经过包括国外经贸争端在内的市场和政策调整有所缓和，近年在新环境下过剩矛盾又有所增加。又如我国造船业在疫情期间逆势增长取得令人鼓舞成就，然而近来随着全球需求增长放缓也感受到供大于求压力。

新一轮过剩表现形态与成因特点

首先看表现形态特点。一是过剩压力和风险延伸到中高端部门甚至新兴产业。不同于早先产能过剩讨论曾聚焦的棉纺、家电等技术较为低端的传统行业，上述若干产能过剩样本部门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度较高，大都属于中高端行业，有的是新兴和前沿产业，满足市场需求不再是低端为主。可见早先讨论认为产能过剩的隐含假设可能不再成立，事实表明即便是中高端

甚至新兴前沿产业，如果投资和供给能力扩张很快，同样可能在不长时期出现供大于求和产能过剩的压力和风险。

二是新一轮产能过剩行业与产品重要性提升。上述样本部门规模体量较大，通常都涉及几千亿美元市场规模，有的如汽车行业规模甚至超过万亿美元，如果出现产能过剩后续调节过程的影响会更大。另外某些行业如汽车、石化基础原料、芯片等，属于发达经济体传统享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支柱行业，在其经济系统和就业领域占有比较重要地位，这些行业产能过剩在这些国家可能引发比早先时期更为敏感和复杂的反应。

三是过剩产品具有较高可贸易程度与全球性特点。早先过剩行业如水泥、焦炭、电石等可贸易程度较低，然而上述新一轮产能过剩样本部门的产出品单位物理量价值普遍较高，因而在开放环境下与国际进

出口贸易关系密切，产能过剩对国际经贸关系带来冲击较大，甚至可能使得现行国际经贸规则和秩序面临新的压力。另外汽车、半导体等行业基于其模块化生产方式特点，国际产品内分工程度较高，是上下游全球供应链延伸较长的代表性部门，其产能过剩会通过供应链分工渠道产生更为复杂的跨国性或全球性影响。

另外新一轮产能过剩产生根源也呈现与早先过剩不同的特点。**首先，疫情大流行时期很多国家部分商品供不应求刺激投资是新一轮产能过剩的特殊成因。**疫情大流行对供给和需求两侧的不对称冲击造成不少国家某些商品一时供不应求，特别是美欧等国超常宏观政策刺激需求助推严重通胀，诱致全球范围大规模投资。以全球半导体行业资本形成为例，从 Statista.com 商业数据平台提供的全球芯片领域投资数据看，2020-2023 四年平均半导体投

资 1480 亿美元，约为此前 20 年每年平均 590 亿美元的两倍半。疫情特殊因素刺激的投资急剧飙升，在投资完成后转化为产能超常增长，市场需求难以保持超高增速会派生产能过剩压力。

其次，我国近年产业升级加速伴随产能扩张因素影响。在产业升级、鼓励创新、疫情期外需激增等因素的作用下，近年我国制造业升级和产能扩张加快，显示我国经济长期追赶的成就；然而内需增长受多重因素制约整体偏弱，“供强需弱”格局不利于充分吸收国内产能，与疫情期外部需求激增双碰头，助推工业品贸易顺差较快增长，客观上对新一轮产能过剩产生某种影响。如近年我国芯片投资扩张较快，增速显著超过世界其它地区；又如我国一段时期以来投资较多大化工项目，石化基础原料产能全球占比近年大幅上升。我国过去三年均值工业品贸易顺差增长到超过

1.6 万多亿美元，比 2010-2019 年均值 8600 多亿美元增长近一倍；近两年工业品贸易顺差占国内工业增加值总量比例超过 30%，意味着目前国内工业部门约三成产能释放需通过外部贸易顺差来实现。

再次，原有国际产能过剩自发协调机制部分失效。近现代全球经济史包括不同部门产业活动的国际转移与承接（如产品周期理论、雁阵模型从不同角度阐释的），伴随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相应演变，对产能过剩在客观上产生某种自发调节抑制作用。另外在开放环境下，如特定行业明显产能过剩，不同国家企业趋利避害也会酌情调减投资和产能，有助于避免出现全球产能过度失衡或失控情况。然而在近年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演变环境下，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同时借助产业政策在某些被认为具有特殊意义部门扩大投资或谋求进口替代，导致上述自发协调机制

一定程度失效。上述演变会机制性增加某些部门跨国性全球性产能过剩风险，并对原有国际经济协调和治理机制和规则造成新压力。

新一轮产能过剩影响与应对政策

新一轮产能过剩对经济内外形势会产生多方面影响。如产能利用率与价格走低，会倒逼国内相关产业兼并重组，提升行业集中度成熟度并派生优胜劣汰作用。然而价格水平和合意投资强度从高位区域回落，会在边际上增加经济供强需弱的不平衡矛盾。另外在效率提升、产能过剩与实际汇率走低综合因素作用下，过剩行业的企业进一步扩大出口释放压力，可能会对外部经贸关系产生更为复杂影响，尤其需适度关注并未雨绸缪。

首先是美西方会在双边和多边场合提出和发挥相关议题施压。如美国商务部长

雷蒙多去年夏季就片面指责我国巨额芯片投资补贴，导致成熟芯片³和传统芯片⁴产能过剩。美财长耶伦去年底不止一次提到对中国产能过剩担心，提醒“中国体量太大，无法仅通过出口来实现增长，而且其经济政策选择产生着深远影响。”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副部长尚博今年2月初访华进行两国经济工作组对话时表示“勿以倾销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还提出“如果中国试图通过在国际市场倾销货物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美国及盟友将会采取行动回应。”⁵

疫情期间美西方国家严重通胀需要增加从我国进口，对我贸易顺差增长采取了较为隐忍的相对中性立场；随其通胀形势趋缓与国内经济政策重心转向维护增长和

3. 采用 40 纳米及以上技术生产的器件。

4. 采用 28 纳米及以上技术生产的器件。

5. 美国警告中国 勿以倾销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联合早报》2024 年 2 月 20 日。

就业目标，对我贸易平衡问题关注度及政策干预意愿都在上升⁶。在这个背景下，产能过剩在 WTO、G20 等多边场合也都可能成为新议题。

去年 10 月欧盟对我电动乘用车反补贴调查或被其它国家仿效并延伸到其它面临产能过剩压力部门。美国近年挑起经济争端时频繁诉诸国内法提供的单边争端工具，不排除就产能过剩和顺差增长借题发挥挑起争端。今年是美国大选年，美政客会在对华政策上竞相强硬以博取选票，渲染产能过剩与贸易不平衡。美国少数强硬派一段时期以来鼓动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PNTR），如去年底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发布一份重置（reset）两国经济关系的专题报告，第一组建议就是有关“如何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设计，产能过剩可能会被这派主张者借题发挥。

6. 卢锋：贸易失衡会否重回国际对话热点，《财新网》2023 年 9 月 18 日。

针对新一轮产能过剩特点，需统筹国内国外综合施策加以应对。经过长期发展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和供给能力取得历史性进步，少数部门已跻身全球前沿，然而在整体上与主要发达国家比较仍有相当差距，某些关键部门存在明显供给短板，因而需持续投资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基于现实考虑，未来投资扩大产能要更好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加重视开放型市场经济的供求平衡规律，发展新质生产力时关注和防范产能过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重点行业统筹布局和投资引导，防止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鉴于现实形势需加快政策调整以落实上述要求。

要通过积极宏调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着力提振内需和修复“供强需弱”不平衡从而增加国内产能吸收能力。日前国务院正式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开展汽车、家电、

家居等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促进相关行业消费，有利于吸收工业产能缓解过剩压力。另外还需要深化改革优化完善中长期收入分配政策，逐步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所得比例偏低格局，通过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在根本上提振消费需求，从根本上缓解宏观层面“供强需弱”不平衡和结构性产能过剩压力。

新一轮产能过剩跨国性的全球性因素提出新问题。首先需明确全球化环境下一国企业统筹考虑国内国际市场设计配置产能是合理选择，通过公平竞争获得国际市场相应份额是我国企业在开放环境下的天然权利。对贸易伙伴国超越国际经贸规则以产能过剩为名打压我企业的保护主义举措，我们无疑应明确反对和据理力争，保留采取反制的权利，维护我国企业和国内产业发展的应有权益。

同时需采取措施应对外部经贸关系压

力。除了上述提振内需特别是消费举措，还要通过一揽子措施稳定近年实际汇率偏弱走势，推动人民币实际汇率逐步回归温和升值从而对贸易不平衡进行适度调节。我国贸易顺差绝大部分集中在美欧等经济体，官方采购可适当扩大从相关国家进口缓和不平衡。新一轮产能过剩或使国际经贸秩序进一步承压，我国作为新兴大国可在多边经贸、金融、发展机构及 G20 发挥更加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社会建设性应对新一轮产能过剩。维护国际经贸规则秩序，对全球经济有利，对新兴大国利益更大。

徐高⁷：中国经济的上中下三策，要避免滑入下策的不利局面

非常高兴在国发院成立 30 周年之际，来到我们国发院的品牌论坛“经济观察报告会”现场汇报我的观点。借此机会，我准备把我国中长期的分析框架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事实上，只要中长期的分析框架理清了，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借助这一框架回答短期问题。我的整体框架说起来很简单，我国在收入分配结构导致消费不足的前提下，当下我国只有上、中、下三策可选。当前我国经济之所以有较大下行压力，根本原因是我们不恰当地走向下策。下面，我从我国收入分配所导致的消费不足问题

7. 徐高：中银证券总裁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兼职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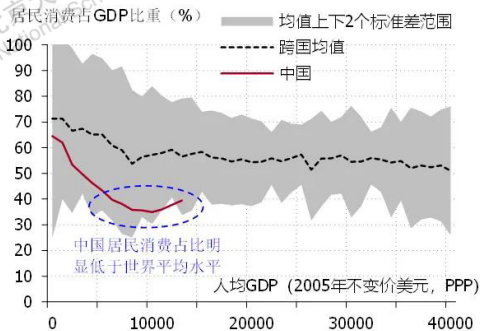
讲起。

我国的关键问题是消费不足

几年前中央文件讲得很清楚，我国经济面临着供给冲击、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现在疫情过去了，供给冲击已经消退。但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这两重压力反而变得更加沉重。需求收缩不是新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到现在，我国经济一直面临内需不强的局面。内需不足的背景下，在外需不强的时候，我国经济就会陷入总需求不足、增长乏力的局面。所以说，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约束在需求面，而不在供给面。经济总需求无非来自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三项。其中，消费和投资是内需，净出口是外需。我国需求不足的源头是我国的消费不足，即消费占我国经济的比重太低。跨国数据显示，在超过1万美元（2005年不变价计算）

的各人均 GDP 水平上，世界各国的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平均都在 55% 附近。而我国在人均 GDP 水平上升的同时，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却持续走低，现在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差不多 15 个百分点。就算把政府消费加上，计算我国总消费占 GDP 比重，也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差不多 15 个百分点。（图表 1）

图表 1. 我国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意味着经济增长未能充分惠及居民福利



资料来源: PWT

公众号 · 徐高经济观察

消费占 GDP 比重低，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果实没有充分惠及到居民福利。按道理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主要表现为对更高消费的期待，即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玩得更好等等。一个国家消费占 GDP 的比重如果较低，经济总量增长（反映在 GDP 上）和老百姓的个人感受之间就会脱节。因为国民总储蓄被定义为国民总收入减去消费，消费占比低就意味着储蓄占比高——这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我国目前的储蓄率（储蓄占 GDP 比重）超过 40%，差不多是世界其他国家平均储蓄率的两倍。在组成内需的消费和投资两块中，消费才是最终需求，而投资只是派生性的需求。一般情况下，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投资回报。在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时候，投资意愿会比较低。如果此时收入不能自发从投资者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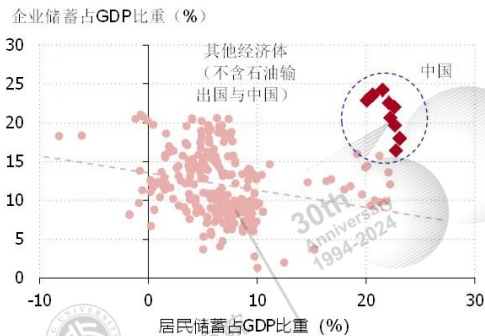
转移到消费者手中，变成更多的消费，就会出现消费与投资都弱的内需不足的情况。所以，我国消费占 GDP 比重长期偏低，就会带来内需的长期不足。

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的割裂导致我国储蓄偏高

要分析中国低消费、高储蓄状况的成因，既可以从消费入手，也可以从储蓄切入。这里，我们以我国储蓄为分析对象，揭示我国低消费高储蓄的产生原因。一个国家的总储蓄来自国家里居民（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三大部门各自做出的储蓄。由于政府储蓄规模一般较小，所以国家总储蓄主要由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两部分构成。居民储蓄就是居民收入减去居民消费。企业储蓄则是企业收入减去企业消费。这里的
企业收入是国民经济核算口径的收入，实际上是企业分红之后的利润，而非企业

财务报表中的营收。又由于企业消费等于零，所以企业储蓄实际上等于企业分红之后的利润。在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的跨国比较中，我国的独特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过去 10 多年的数据中，可以发现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之间有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企业储蓄占 GDP 比重较低的国家，居民储蓄占 GDP 比重就相对较高；企业储蓄占 GDP 比重较高的国家，居民储蓄占 GDP 比重一般就偏低。我国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占 GDP 比重都很高，而且二者之间缺乏其他大多数国家那样的负相关关系——这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反差。（图表 2）

图表 2. 我国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都很高，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显著差异



资料来源：UNData

公众号 · 徐高经济观察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里，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之所以有负相关关系，是因为当企业股权持有在居民手中时，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影响居民的财富水平。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假设经济中凭空多了 100 元的收入。第一种情况下，这 100 元收入流向了居民部门，并被居民部门存到了银行里。这样，

居民部门的资产增加 100 元（是居民银行存款的增加），居民部门总财富增加 100 元。第二种情况下，这 100 元收入没有流向居民部门，而是流向了企业部门，并被企业部门存到了银行里。这时，企业部门的资产增加 100 元（企业存款）。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随着企业资产的增加，企业的股票价值也会随之增加 100 元。而如果企业的股权持有在居民部门手里，居民部门的总资产也会增加 100 元，并最终让居民部门的财富也增加 100 元。所以，如果企业部门的股权被居民部门持有，则不管收入是流向居民部门，还是流向企业部门，最终都会变成居民的财富。换言之，只要企业部门的股权在居民部门手里，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就都是居民的财富，收入在企业与居民两大部门之间的分配不影响居民的总财富规模。在经济学里，这个结论叫做“刺穿企业帷幕”。（图表 3）

图表 3. 被居民拥有的企业只是蒙在居民部门之上的一层面纱——企业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应影响居民的财富总量

100元收入流向居民部门

居民	
资产	负债
+100元 (居民存款)	

=

100元收入流向企业部门

居民	
资产	负债
+100元 (企业股价)	

企业	
资产	负债
+100元 (企业存款)	

公众号：徐高经济观察

但以上结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企业部门的股权要被居民部门持有。大量存在的国有企业使得我国与这一前提条件所要求的状况明显不同。国有企业当然是全民所有的，只不过其股权大部分被国家持有。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分红的大部分会流向国家而非流向居民部门，国企分红之后的利润也并没有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有直接联系，难以起到直接提升居民财富之功能。

当然，国企通过支付工资、缴纳税收、向国家分红等多种形式支持了国民经济发展。但问题是，我国居民部门并不能直接感受到国企对其财富的提升作用。而居民

消费水平决定于其财富规模。于是，国企的分红和储蓄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就比较弱。这是我国消费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由于我国市场化改革时间也就40多年，不少民营企业的股权高度集中。而消费主要是由广大普通消费者做出的。这些被少数人集中持有的民营企业股权，也难以给广大普通消费者直接带来财富效应，因而对居民消费的贡献有限。

由于以上的两方面原因，特别是由于我国国企总规模较大，就使得我国居民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财富效应的联系偏弱。于是，我国企业储蓄占GDP比重虽然不低。但这些储蓄却难以被居民部门直接使用。因此，我国居民部门自己还需积累起较大规模的居民储蓄。规模都很大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加起来，让我国的总储蓄反常的高。

我国调节消费与投资的市场力量不足

对任何一个经济来说，国民总收入中有多少应该变成消费，有多少应该变成投资，应该取决于投资回报率的高低。换句话说，消费与投资占 GDP 的比重分别应该是多少，由投资回报率这个价格指挥棒来调节。当投资回报率高的时候，经济就应该多投资、少消费；而投资回报率低的时候，经济就应该少投资、多消费。有这样的市场机制调节，才能保证经济中的投资和消费占经济的比重持续处在最优的水平。

我们都知道，消费主要是由居民部门做出，投资主要是由企业部门做出。在国民经济初次收入分配中，居民所获得工资收入和企业所获得的资本回报占经济的比重大致恒定，不会因为资本回报率的变化而有太大变化。因此，资本回报率对消费和投资的调节作用只能通过二次收入分配，尤其是二次收入分配中企业部门向居民部

门的分红来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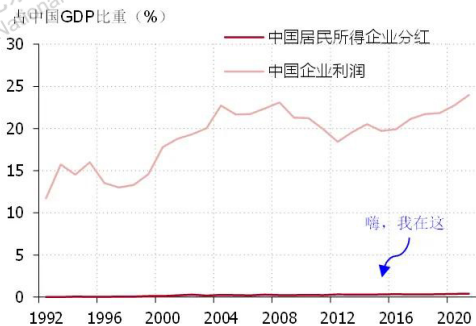
当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时候，企业部门应当少向居民部门分红，从而将更多企业部门初次分配得到的收入变成投资。反过来，当投资回报率比较低的时候，企业部门就应该向居民部门多分红，从而让更多收入从企业部门流向居民部门，从而让投资规模下降，居民部门的收入和消费上升。可以说，投资回报率对消费和投资规模的市场化调节，正是通过企业向居民分红规模跟随投资回报率的变化而变化来实现的。离开了这种市场调节机制，经济中消费与投资的占比就会偏离最优水平。

以上这种市场调节机制要发生作用，前提条件是企业股权大部分被居民部门持有，居民部门因而对企业分红决策有话语权，可以在需要企业分红的时候要求企业向自己分红。而前面讨论我国高储蓄问题时，我们其实已经分析清楚了，我国居民

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的割裂，让这种市场调节机制很难发挥作用。

来自我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过去 20 多年，尽管我国企业利润占 GDP 比重一直在 20% 左右波动，但我国居民部门获得的企业分红（包括国企和民企的分红）却一直不超过我国 GDP 的 0.5%，微乎其微。（图表 4）

图表 4. 我国居民部门从企业部门获得的分红收入微乎其微，企业部门收入难以通过分红的渠道流向消费者



资料来源：CEIC

公众号 · 徐高经济观察

所以，尽管现在我国已经投资过剩，投资回报率偏低，按理说我国应该减少投资、增加消费了，但因为在现实中企业向居民部门的分红渠道不畅，从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的收入转移受阻，所以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所获得的收入继续大量留在企业部门，刚性变成企业储蓄和投资。这样一来，我国投资规模就因不受投资回报率的调节，而长期处在过高的位置。这是我国储蓄过剩、投资过剩产生的主要原因。

当然，微观经济主体（哪怕是国有企业）多少也会在乎自身的投资回报率高低。在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时候，微观企业的投资意愿还是会有所降低。只不过，企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由于无法有效通过分红渠道将其收入转移给消费者，所以只能将其储蓄的大部分继续握在手里。企业投资意愿低迷，再加上企业储蓄难以向居民部门流动的状况，就会在经济中带来投资规

模小于储蓄规模的倾向，从而让储蓄过剩演变成为内需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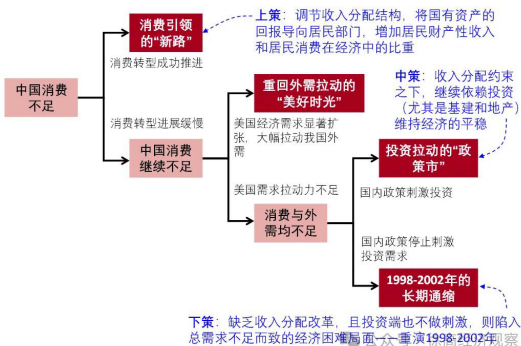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的上、中、下三策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我国经济运行关键阻塞是二次收入分配中，企业与居民两大部门间的收入转移规模对投资回报率不敏感，导致收入在企业与居民两大部门间的分配缺乏市场化的调节机制。这种市场机制的缺乏令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占 GDP 比重过低，长期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又衍生成为内需不足，从而让我国经济增长在长期面临需求的约束。

所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在需求面，而不是在供给面。聚焦于供给面，试图从供给方给当前中国经济找病因、开药方的思路（比如以人口老龄化来试图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搞错了方向，只能带来误解和误判。

经济的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外需（净出口）三部分组成。其中消费和投资可为我国自己掌握，外需则主要受外国影响。从我国消费不足的逻辑起点出发，我国有上、中、下三条对策可选：“上策”是通过有利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改革来真正推进消费转型；“中策”是在收入分配改革进展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刺激投资来稳定增长；“下策”则是在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前，停止刺激投资（甚至打压投资）。（图表 5）

图表 5. 消费不足前提下，中国经济有上、中、下三条对策



下面具体来谈上、中、下三策的具体内容。

“上策”是通过“全民国企持股计划”来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而增加经济中消费占比，实现消费转型。

要提升我国消费占GDP比重，必须从增加居民收入入手。居民收入如果不能明显增加，刺激消费的政策将难有效果。而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要增加居民收入，更重要的还是要建立起依照投资回报率这个价格指挥棒的变化，来动态调节收入在居民和企业两大部门间分配的市场化机制。

要建立这个机制，光靠给老百姓发钱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让居民对企业的经营行为、投资和分红决策有话语权。我国现存的庞大国有企业，为实现这一点创造

了条件。国有企业当然是全民所有的。接下来要让老百姓更直接地感受到他们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让国有资产在老百姓那里“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让国有资产的回报更直接地惠及老百姓，从而支撑民众的消费。我之前曾专门撰写过《以“全民国企持股计划”根本化解中国经济的困局》一文，详细阐述过这一方案的构想，此处就不再展开了。【1】

如果能够做这样有利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改革，则可以从根子上化解我国长期因消费不足而来的内需不足，增长缺乏可持续性问题，也可以让经济增长更加惠及人民群众的福利，真正落实高质量发展之要义。

当然，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时间。在我国成功推进消费转型之前，仍然需要靠外需或投资来创造需求，稳定增长。而外需的决定权并不在我国。考虑到我国经济体

量已经相当庞大，海外经济拉动我国外需的难度已经变得更高。此外，海外越发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给我国出口制造了越来越大的障碍。因此，我国很难回到 2008 年前靠外需拉动而经济繁荣的局面——依靠外需并非是我国的一条对策。在收入分配改革未能实质性推进，外需又不是很强的时候，我国经济能否保持平稳，关键要看国内投资的强度。这就引出了我国可选的中策和下策。

“中策”是在消费仍然疲弱（收入分配改革进展有限）的前提下，继续通过刺激投资来创造需求，稳定增长。这条对策当然不是最好的出路——上策才是我国的最优选择——但它是在收入分配结构约束下的“约束最优”。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中策不是“最优”（上策才是“最优”），却是“次优”。

当然，持续刺激投资来拉动需求有其

弊端。比如，我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债务负担。又比如，我国地产开发商的杠杆率不低，部分开发商过度追求高杠杆、高周转的商业模式也有难以为继的风险。因此，这种投资拉动增长模式确实容易遭人诟病。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近些年我国在刺激投资方面越发审慎，甚至还在近些年出台了令地产投资明显走弱的地产去杠杆政策。这些打压投资的措施虽然看起来有其合理性，却弊大于利，是比中策更糟的下策。

“下策”是在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时，停止刺激投资，又或甚至打压投资。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很可能重演1998到2002年长期通缩，以及大面积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的局面。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我国消费不足、投资过剩的经济结构失衡，根子在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收入分配结构。这个收入分

配结构不会因为打压投资、放任经济增长下滑而自动优化。打压投资，并不会像某些天真者所设想的那样让经济结构自动平衡，而只会让需求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进而引发供给面的被动收缩（企业的倒闭和工人的失业）。这种只看局部，不看宏观经济整体的片面思维，正是近些年我国宏观政策出现“合成谬误”的主要原因。

需辩证看待“中策”

现在再来仔细看看“中策”。在许多人眼里，中策这种靠投资拉动的老路不能再走了。不过，在盲目否定中策之前，有一点必须要搞清楚，我国当前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人民群众显著提升的收入水平，就是过去几十年我国走所谓的老路走出来的。事物都是二分的，有利也有弊，有弊也有利，需要辩证看待。

中策这种投资拉动的模式当然有其消

极的一面。这条路可能产生过度而低效投资，意味着经济增长果实不能充分转化为居民福利提升，还会带来经济结构的失衡和需求不足，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内生持续性的缺乏。

但中策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储蓄过剩和投资过剩，本身就意味着我国更快的资本积累速度和随之而来的更高经济增速。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我国在资本成本方面的巨大优势。

资本的成本是资本所有者对资本回报率的要求。资本所有者对资本回报率的要求越高，资本就越贵，反之资本就越便宜。前面分析过了，我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是我国消费和投资的规模不受投资回报率这一价格指挥棒的调节，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时候投资规模难以相应下降。这其实就是说，我国投资对投资回报率不敏感，即使投资回报率很低了，我国也会继续投资。

在其他更加市场化的国家，很难做到在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时候仍然继续大量投资。

当一个对投资回报率不敏感的经济主体，和一个对投资回报率敏感的经济主体，在同一个市场中竞争时，最终多半是对投资回报率不敏感的经济主体胜出。这是因为后者的投资强度没法赶上前者。事实上，我国已经在一次又一次的行业里展现了这种资本成本优势带来竞争力。只要我国越过了某个行业的技术门槛，产品为市场所认可，我国就会依靠大量对回报率不敏感的投资而占领这个行业，并最终让这个行业产能过剩。最近正在重演这个故事的行业就是汽车行业。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储蓄和投资本身都不是目的，而只是为了在未来获取消费的手段。在西方经济学看来，储蓄（和投资）不过是将现在的消费转移到未来的工具——储蓄（和投资）无非是牺牲当前的消费，以求在未来获取

更多的消费。如果储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太低,那么将消费从现在转移到未来就不划算了,因而也就应该减少储蓄(和投资)。这是储蓄(和投资)规模应该对回报率敏感的最根本原因。

我国的储蓄行为显然与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想法不一致。初次分配中流向我国企业部门的收入,因为缺乏向居民分红这一个二次分配的调节手段,因而刚性转变成了储蓄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储蓄的目的并非完全是为了在未来获得消费,而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在微观层面上做大做强企业,宏观上做大做强我们的祖国。我们甚至可以说,我国很大程度上是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储蓄。这种刚性的储蓄违背了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将储蓄当成“工具”的论点,却是我国独特的国情之一。

事实上,我国这种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而做的储蓄，与西方学界讨论很多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1904年，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二章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既要挣钱，而且多多益善，同时又要力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乐……人活着就要去赚钱，就要把获利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经济获利活动不再作为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手段而从属于人了……它是极其无理性的，但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项指导原则。”

韦伯将“经济获利活动”当作为了目的，而非从属于“生活享乐”（消费）的手段。后来的经济学家将韦伯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总结成为上帝而储蓄，而不是为未来的消费而储蓄。在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国家经历过资本快速积累、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陈志武和 Bakshi 于 1996 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资

本主义精神与股票价格》研究的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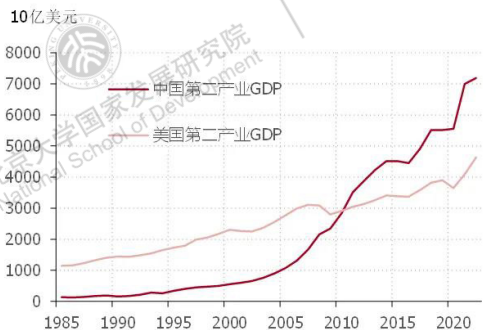
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与资本主义有根本差别。我国追求的是市场与政府的有效结合，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但在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方面，我国的储蓄过剩与韦伯讲的资本主义精神有相通之处。

当代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偏离了“资本主义精神”，而日益变成追求消费和享乐的国家。其结果自然是其资本积累速度和经济增速的下降。这一点又以美国为甚。当失去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西方国家碰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储蓄”的中国，自然是后者对前者的赶超。

目前以市场汇率计算，我国 GDP 总量大概只有美国 GDP 的 70%。但如果只

看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我国第二产业的 GDP 已经是美国的 1.5 倍，早已远超美国。我国在生产能力方面对美国的赶超，背后有我国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的功劳。（图表 6）

图表 6. 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储蓄”的中国碰上早已失去“资本主义精神”的美国



资料来源：万得

公众号·徐高经济观察

在一个个具体行业中，我国所走的“中策”就体现为我国在行业中的强大竞争力。

只要我国的技术水平越过了行业的门槛，产品为市场所认可，我国在资本成本方面的强大优势就会在行业中体现出来，快速改变行业竞争格局，让我国成为行业中的重要玩家，乃至成为行业冠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情况已经在许多行业出现。近些年新的例子是我国的汽车行业。

2020 年以来，借着新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我国汽车行业取得重大突破，产品和品牌受到市场的认可。其结果是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2020 年初的时候，我国月度汽车出口量还不到 10 万辆，而现在已经接近 50 万辆。在这背后当然有新能源转型带来的弯道超车的机会，但同样重要的是我国建立在资本成本优势上的强大竞争力。

所以，在看待我国传统投资拉动型的“老路”时，也即我国可选的“中策”时，必须要采取辩证的态度，不能只片面地看

其弊端，简单粗暴地一味否定。

中国经济要避免走下策

2021 年以来，尽管我国汽车行业取得历史性突破，但经济下行反而加大，主要原因就是地产行业在融资紧缩政策压力下，落入了恶性循环。

2021 年地产融资紧缩政策出台以来，我国地产投资资金来源规模收缩了一半，令地产开发商信用风险显著上升。这让购房者因担心期房交付问题而“惜购”，金融机构因担心坏账风险而对地产开发商“惜贷”。“惜购”和“惜贷”反过来又会让开发商资金压力更大，信用风险进一步上升。其结果是地产行业深陷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早在 2022 年 7 月 12 日北大国发院举行的“2022 下半年经济展望与房地产转型”

论坛上，我就详细谈过地产的问题，并给出了放松对地产行业的融资管控，成立地产业短期纾困基金来消除地产开发商的信用风险，以及构建更有价格弹性的土地供给制度这三条政策建议【3】。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对地产行业的借助政策还没有有力地触及到开发商信用风险这个行业主要矛盾，地产行业仍然低迷。

几年前我国之所以会出台针对地产行业的融资紧缩政策，固然有化解部分地产开发商高杠杆经营模式之风险的考虑，更重要的则是因误解而不认可“中策”。有观点认为推进去杠杆、打压投资，经济就能自发平衡。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这种观点没有看到我国因收入分配格局而来的消费不足这一根本约束，因而只是一种天真的一厢情愿。

在增加居民收入的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走中策，通过投资（尤

其是基建和地产投资）来创造需求稳定增长，虽不是我国经济的“最优”，却是在收入分配约束下的“次优”。在收入分配的约束之下，消费很难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在需求面的有力引擎。此时，打压投资就是自废武功。天真的人可能以为把投资打下去了，经济结构就会自动优化。但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是会让我国重回 1998 到 2002 年那种长期通缩的状态，给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巨大压力和风险。

因此，当前我国尤其需要避免走“下策”，需要保证投资的稳定来稳定经济增长，进而在中美大博弈中站稳脚跟。

2023 年 12 月上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层领导已明确要求政策要“先立后破”。近些年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我国在树立新增长点，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做得相当不错。换言之，我国在“立”的方面，做的是成效显著、可圈可

点。但我国现在对传统增长引擎（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盘），“破”得过了头。某些“破”的举措，背后既缺乏理论基础，也缺乏实践的支撑。

因此，我从去年就开始讲，我们一定要在政策上纠偏，更加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设计政策【4】。不仅如此，我们还更要在认识上纠偏，对那些诸如“加杠杆经济就不可持续”、“债务就是毒药”的偏颇观点要纠正，否则我国经济恐怕会滑向“下策”这一最不利的局面。

当前我国经济虽然面临下行压力，但我国政策的回旋余地仍然很大，完全有能力保证经济增长的平稳。在未来，我国需要坚决避免走向“下策”，而用“中策”来争取时间，最终用“上策”来化解我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之要义。

【1】徐高，《以“全民国企持股计划”根本化解中国经济的困局》，《当代金融家》2024年第2期，30-33页。

【2】Bakshi, Gurdip S and Chen, Zhiwu, (1996),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d Stock-Market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 issue 1, p. 133-57.

【3】徐高，2022年7月25日，《中国房地产业的困境和对策》。

【4】徐高，2023年6月28日，《需要全面纠偏对我国债务的认知》。

罗志恒⁸：中国财政的家底与未来

关于中国财政的现状和未来展望，我想借此机会探讨三个问题。

1. 当前的财政形势如何？自媒体的传播中经常有对中国财政误读的言论，有必要澄清中国财政的真实情况。

2. 中国财政的未来空间有多大？如果有空间，主要在哪里？如何充分利用起财政空间？

3. 面对当前的财政形势和未来的发展空间，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以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更好支持高质量发展？

8. 罗志恒：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我先谈谈基本结论，后续再展开。第一个问题，当前的财政形势可以用“紧平衡下的负重前行”来概括。当前存在阶段性收支矛盾，部分地方政府基层财力紧张，出现了乱收费的现象，也有部分地方出现了削减支出如停暖气、停公交车、延迟发放并降低公务员工资等；但也要看待地方政府仍在努力应对，并没有躺平，通过盘活存量资产资源和提高支出效率来负重前行。紧平衡是客观状态，前行是主观态度。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国的财政空间是有的，这是由我国的经济性质、货币金融环境和负债率水平决定的，但也要注意空间有所收窄。作为一个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国家，我们拥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和资源，天然能够匹配更多的债务，提供了财政政策的空间。此外，我们的货币金融环境与财政积极配合，利率水平总体下行，为债务付息提供了很好的环

境和回旋空间。当然，也要认识到财政空间主要在中央以及人口持续流入的东部地区。

对于第三个问题，面向未来，鉴于部分地方的财政压力以及财政空间有所缩小，有必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既解决财政体制本身优化的问题，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的财税制度基础。

下面我展开分享我对中国财政家底与未来的分析。

当前的财政形势：在紧平衡中负重前行

我们通常认为财政和货币是宏观调控中两个有力有效的抓手，但是我在研究中越来越发现，经济下行期财政的效果更好，财政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财政既具有总量调节效果，而且结构性更加突出，不论是减税降费还是给予补贴等都是“指哪打

哪”，直接作用于市场主体，传导链条短；更重要的是，财政还具有改革的职能，甚至财政行为本身就是改革，改革、发展、稳定都离不开财政。财政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有利于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所以，我认为未来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财政将起更加主导的作用，货币从数量、价格和结构上做出配合协调，比如配合财政发债、提高国库存款收益、推动投融资平台转型等。

财政问题引发市场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主要始于最近几年。2020 年的财政形势用八个字概括就是“数据难看，日子好过”。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一方面导致经济下行、财政减收，另一方面还要求更多的疫情防控支出，一减一支，压力就来了，因此我称之为“数据难看”。但随后迅速发行了 1 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并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所以日子尚可以过。

2021 年的财政形势还是八个字，但是反过来了，叫“数字好看，日子难过”。因为 2021 年，我们控制住了疫情，经济开始恢复，在低基数的作用下，财政收入数据非常好看；同时，不再发行特别国债，财政政策积极程度有所回落，所以就出现了财政日子开始难过，要精打细算了。

那么 2022 年至今，我们总体处在紧平衡中，这种平衡既有收入和支出之间，又有支出内部“三保”、科技、民生间的平衡，从要过紧日子逐步到要习惯过紧日子。财政总体仍是积极的，但更加重视提质增效，就是更重视花钱的效果了。

何谓紧平衡？具体可以看看四个方面。

第一，收入形势：大规模减税降费和
经济下行导致宏观税负持续下行、财政汲
取能力下降。

自 2012 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

增速换挡期，面临内外部风险挑战，因此我们采取了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这些措施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了企业现金流，同时应对了特朗普税改对资本外流的影响。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在2015年底启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降低成本在财税领域表现为大规模减税降费。这是面临内外部形势而采取的措施，直接结果是宏观税负下降。

2015年之前，在大多数年份中，财政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自2015年底以来，财政收入增速开始低于经济增速。在狭义宏观税负方面，就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在2015年达到顶点，2023年下降到17.2%，大约下降了5个百分点。

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税收、土地出让金、国有资本利润上缴和社保缴费，分别对应政府的四本预算：一般公共

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预算收入加总后，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可以评估政府的广义财政实力，除以 GDP 就得到广义宏观税负。

数据显示，去年广义宏观税负水平位为 30.2%，为近十年来的低点。当宏观税负下行时，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同步削减支出，这可能导致公共服务水平下降；二是增加债务弥补收入端下行。从各省情况来看，去年有 8 个省份，包括广东、江苏等财政大省，与 2021 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下降的。

在土地出让方面，我对比了 2023 年和疫情前 2019 年的数据，发现大部分地区土地出让收入都出现负增长。以昆明为例，疫情前土地出让在 1000 亿元以上，而去年仅为 100 亿左右，下降接近 90%。类似情况比如在哈尔滨、长春等城市。房

地产形势的低迷直接影响到政府收入，尤其是对地方政府的影响更大，因此稳定房地产形势对财政和经济意义重大。

第二，支出形势：多元目标考核、经济社会风险财政化增加了财政支出责任范围和刚性程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有效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证”。由此可知，财政已经不再仅仅是经济概念，而是上升到了国家治理层面。国家治理必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多个方面。因此，财政工作不仅要保障民生福利，还需要扩大总需求，推动投资增长，以及防范和化解社会重大风险。这么多的目标导致财政支出规模明显扩张，支出刚性程度不断提高，政府支出责任也在扩大。

具体从支出分项可以看到，2023 年各项支出中增速最快的是社保与就业支出，达到了 8.9%，而过去几年该项支出增速一直较高，这直接就使得社保支出的占比不断提高，2023 年相较 2013 年明显增加，意味着中国财政的支出结构逐步从以物为主逐步转向到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本投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保压力上升，直接影响到全国社保基金预算对公共财政的依赖程度显著增加。在中国人口发展历程中，伴随经济在 1962 年之后逐渐恢复，出生人口持续增加，1962-1973 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 2500 万人以上，1963 年更是达到了 3000 万人以上。这就意味着 60 年后的今天，也就是 2022 年-2033 年将是退休领取养老金的高峰。当前正值“婴儿潮”一代领取养老金的高峰。2023 年的全国社保预算收入达到 11 万亿，其中有 2.5 万亿来自公共财政

补贴，这相当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9.2%，这就可能挤压一般公共预算的支出。同时，我们还看到，利息支出的绝对规模上升了，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中利息支出（国债+地方一般债）达到11829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地方一般债+专项债）支付利息12288亿元。

另一个问题同样值得关注，近年来我们面临着多种经济社会风险。房地产领域存在烂尾楼等风险，因此一些地方政府设立了房地产纾困基金。事实上，保供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刺激需求，这种财政支持房地产就是房地产风险财政化。再比如，金融领域出现一些风险等，许多老百姓购买的理财产品受到影响，这些都需要政府垫付一系列资金以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宏观税负下行，支出责任范围扩大、支出刚性程度增加，这就导致财政收支差扩大，因此对财政统筹能力提出更

高的要求，高度依赖调入资金和非税收入。去年的一般公共收入为 21.6 万亿，支出约为 27 万亿，之间存在近 6 万亿的缺口。通过去年的赤字规模 3.88 万亿弥补了部分，还有 2 万亿左右的缺口。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包括通过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资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以及历史结转结余资金来弥补这一差距。

这就意味着，未来的财政理财高度依赖于财政资金的统筹和协调，以及土地出让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然而，土地出让收入可能仍会下降，这是一个挑战。

第四，收支矛盾的一部分通过财政统筹能力解决了，还有一部分源自赤字，赤字形成的存量是债务规模，当前地方债务总体可控，但专项债使用效率下降和城投还本付息、转型的问题仍要解决。当前显性债务规模达到 70 万亿，分别是中央政府

30 万亿，地方政府 40.7 亿。其中，国债占比约为 40%，地方债占比为 60%。地方债中，一般债占比约为 40%，专项债占比 60%。这种四六开的结构有必要调整，就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要优化中央和地方债务结构。因为国债举债周期更长、举债成本更低，而当前国债占比又低，通过国债比重、地方债中一般债比重，是有利于拉长周期、降低成本的，进而降低债务风险。

未来的财政空间：受三大因素影响，空间主要在中央和人口流入的省份

财政空间取决于一国的经济性质、货币金融环境以及债务风险水平。第一，我国是公有制经济体制，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意味着能够支撑更高的债务水平。赤字是流量，债务是存量，真正约束我们举债规模和空间的是还本付息，特别是付

息带来的刚性约束。第二，当前，我们的利率水平和货币金融环境对于举债是友好的，能够承担更多的债务。第三，从当前债务风险水平看，我国政府债务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中等偏低水平，经过化债之后，地方债务风险得到缓释，需要防范的是部分地区的隐性债务。

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国财政是有空间的，那么财政空间在哪呢？我想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有更多的空间。二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空间在于人口流入、产业支撑较好的东部地区，它们的项目储备基础好，能够更好地使用债务。所以未来可以有两个改革：一是定专项债额度时，根据项目储备来定，保障存续项目以及次年的新增储备项目，而非先定额度再来找项目，避免项目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二是专项债额度分配时，优先向人口流入、产业基础好、能高效使用债务的东

部地区。

从 2024 年的预算数据看，中央财政已经在积极作为加杠杆，优化债务结构，为地方政府腾出财政空间，2024 年赤字规模为 4.06 万亿，中央赤字占比 82.3%。此外，还有 1 万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央政府正在积极加大杠杆，充分利用财政空间。

这里我还想强调下如何看待债务的问题，我认为债务本身是中性的，既不是魔鬼也不是灵丹妙药，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债务问题的核心在于两点，一是债务支出的结构和效率。当债务用于高质量发展领域、高效投资领域时，这就是好的债务。债务规模的扩大不会增加债务风险，因为分母是 GDP 或综合财力。第二是债务所形成的资产以及基于资产的现金流与债务还本付息的期限结构是否匹配。只要债务符合这两个条件，即结构优化、效率提高，

以及资产与现金流匹配良好，这种债务就是好的，不会带来大的风险。这是对财政空间的基本看法。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可能方向

面对当前的情况，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应对之策。未来虽然仍有一定的财政空间，但这一空间正在逐渐收窄，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正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短期，我们需要解决收支矛盾，但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实现财政可持续性以及更好地支持高质量发展，这要通过中长期改革实现。我认为，财税体制本身优化以及支持高质量发展，就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两大方面的目标。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主题。回顾

1994 年，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不足的问题，当时动辄出现地方投资过热。为了提高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分税制改革将中央财税收入占比从 1993 年的 22% 提高到 1994 年的 55%，这一举措基本奠定了现今的收入分配格局。然而，当年未能解决的两个问题是中央和地方事权及支出责任的划分问题，以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问题。由于只解决了收入比例而未同步解决支出责任的比例，使财权与事权不匹配。这两个问题留下了尾巴。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在举措上就要解决这两大问题。

对于未来的财政体制改革，我个人觉得有如下几个原则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确定政府规模的合理范围至关重要。只有在明确这一点的前提下，政府规模和职能才不会无限膨胀，进而增加财政压力和负担。

财政财政，财从来不是问题所在，关键在于政，在于政府职能、规模以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是首要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我们需要稳定宏观税负水平，不能再降低了。作为一个大国，没有一定的宏观税负水平，将难以应对各种挑战。因此，今年的减税降费转变为结构性减税降费，更强调精准和有效性，支持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既促进经济发展，又维护宏观税负的稳定。这里我们可以考虑选择对普通老百姓影响不大但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税种做些调整，比如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将高端服务业纳入其中；提高资源税和环保税税率，促进绿色发展。此外，还可以考虑数据财政等新领域。

第三，梳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同时降低转移支付的效率损失。目前中央政府支出占比大

约为 14%，在国际上属于偏低水平。随着共同富裕和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推进，这些问题不是某一个省份能够单独解决的，因此应由中央政府承担更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

最后，推动城投平台转型等措施也是必要的。未来的城投平台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融资类，短期需要保留，但尽可能整合数量较少的平台，其债务要归入全口径债务管理，但从长期看要逐步退出；二是城市综合服务供应商，仍有部分收入来自政府收入和社会消费者，如水电燃气等，但剥离了政府融资职能；三是产业投资公司的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完全市场化运营和融资，经营不善就破产倒闭。

以上我们讨论了许多困难、问题和挑战，但中国经济一路走来，每年都伴随着困难和挑战，我们从来都是在克服困难中不断实现新的发展。我相信，未来我们一

样能够克服这些困难，从而实现更加强大的中国经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林毅夫 + 徐高 + 罗志恒 + 卢锋：中国经济的压力与动力

听众提问：林老师您在新书中谈到了新质生产力以及对它的战略支持，并强调利用比较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我想请教，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如何寻找和发掘比较优势？同时也请您进一步阐述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林毅夫：这个问题非常好。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讨论时提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包含两部分：技术创新与传统产业改造。这两方面都需要结合各地的资源要素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推动。这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念高度契合。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根据我们的比较优势，

而比较优势的来源正是各地的资源禀赋与现在拥有的产业的状况。

我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上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我们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广阔的市场和完善的产业配套，这使得我们在新兴产业这些研发周期短、资本需求相对较低的领域的研发上具有优势。这种优势已经显现，比如，美国人下载最多的前5个应用软件中，有4个是中国企业开发的，这充分展示了我们在软件方面的新经济领域的竞争力。同时，在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板等硬件方面，我们也领先世界。比如特斯拉在美国发展了电动汽车十几年，但产量始终未能突破3万辆。然而，自从它选择在中国投资后，短短一年内便实现了惊人的48万辆生产量，不仅扭转了濒临破产的局面，更是跃升为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企业，也将马斯克推上了世界首富的位置，这些成

绩充分显现我们在需要硬件的新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

至于传统产业，同样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并利用我们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实现产业数字化，从而提高生产率水平，释放新质生产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听众提问：想请教林老师，您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压力是什么？而在克服这些来自外部或内生的压力时，我们最大的动力又是什么？

林毅夫：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压力在于对现状认识的不透彻。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若未能清晰地认识压力源，所采取的政策不仅难以奏效，甚至可能加剧问题本身。例如，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私有化解决，前苏联和东欧的历史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

在当前国际经济下滑的背景下，作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贸易国，中国面临的外部需求减少，这无疑影响到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出口部门的投资意愿和就业创造的潜力，带来了经济下滑的压力。然而，国内仍有大量逆周期调节的空间，尤其是在新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若政府能运用其财政空间，积极发挥作用，采取相应措施，中国经济有望实现稳定发展。

在深入认识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后，我们就不会轻易将问题归咎于“国进民退”的观点。相反，我们会更加聚焦于新经济中涌现的机遇，并主动寻找这些机遇。近年来，新经济的发展势头强劲，尤其是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板等领域，民营经济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预示着民营经济在产业创新升级方面仍有巨大的空间等待挖掘。

同时，传统产业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机

会。通过数字化改造，我们可以大幅提升传统产业的效率。此外，传统经济中每年进口的大量产品中不乏技术水平高超、质量上乘的精品，我们可以积极引进这些产业的先进技术，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提升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这样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还能拓展到国外市场。因此，机会无处不在，只待我们去发现和把握。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环境的挑战，二是我们对当前形势认识的准确性。一旦我们有了深入且准确的认识，就能更好地运用我们的有利条件，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下滑压力。我坚信，我们拥有足够的能力和空间来应对这些挑战，同时也具备巨大的增长潜力。另外，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我们仍有许多改革的空间。通过深化改革，我们可以进一步释放那些因改革不到位而未能充分展现的能力。这

样，我们就能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实现合理的增长速度。

听众提问：近期许多大型房地产公司陷入困境，请教林老师，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对房地产企业的救助是有限度的，甚至可能默许一些企业破产清算？怎么看待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和前景？

林毅夫：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首先，关于房地产行业的定位，政府明确提出了“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这是基于长期稳定发展考虑的。因为许多发展成熟的国家都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对的金融经济危机，我们要避免重蹈覆辙。将房地产定位为居住为主，而非投资工具，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居民福利的提升。

其次，虽然强调了“房住不炒”，但

房地产业仍然是我们的支柱产业。在城镇化进程中，对房地产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更高品质住房的需求也在增加。因此，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是需要去除投机成分，更加注重居住功能。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经营不善的房地产企业可能会面临危机。这如同其他产业中，如果一个企业杠杆率过高，当经济下滑或产业增长放缓时，就可能出现危机，但这是个别企业的危机，总体而言，并没有量变成整个行业的危机。

王贤青：今年两会上 GDP5% 的增长目标备受瞩目，实现这一目标有哪些有利条件？同时又存在哪些不利因素？

徐高：达到 5% 的增长目标确实有一定难度，因为基数已经提高。不过，作为供给过剩的经济体，需求可以通过政策手

段有效刺激，但供给不太可能凭空增加，所以政策调整的空间相对较大。前几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部分原因在于对内需特别是房地产的过度调控。如果政策能够适当纠偏，实现 5% 的增长目标并不困难。然而，最大的挑战在于认识上的纠偏。很多人对房地产持有偏见，认为它不能继续发展，这种观念难以改变。如果能纠正这种认识偏差，问题会更容易解决。

罗志恒：今年 5% 的增长目标与去年的 5% 有所不同，因为去年的目标是基于 2022 年 3% 的增速，而今年则是在去年增速 5.2% 以及过去两年平均 4.1% 的基础上设定的，因此难度有所增加。

最有利的条件在于，基建投资和设备更新可能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撑点。今年财政可用资金增加，包括赤字、专项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都有所扩大。其中，赤字规模为 4.06 万亿元，比去年增加

1800 亿；专项债规模也扩大到 3.9 万亿，比去年增加 1000 亿；今年还将还发行了 1 万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去年增发 1 万亿的国债主要在今年使用。综合这些因素，我们有 10 万亿左右的资金子弹，这一数字明显高于去年的 7 万亿。这是我们今年为支出融资的规模，真正的支出规模在这个 10 万亿左右的数据之上还要加上当年的收入。更为关键的是，地方政府在去年的债务化解过程中倍感压力、充满不确定性，不知道化债走向何方，但如今通过财政与金融协同化债的路径已经相对清晰，那就是短期内，通过降息和展期等手段化解，因此地方政府的预期更加稳定。当然我们也关注到有些重点省份的基建投资受限，严控政府投资项目、不得新增隐性债务，但是严控的是可能新增隐性债务以及效率低下的投资，对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以及高质量发展的领域，仍是支持的。因此，

有理由相信，今年的基建投资将成为重要的经济支撑点。此外，设备更新换代同样具有巨大潜力，其成效将取决于我们的政策实施力度，包括财政支持和货币政策的配合。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有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我们面临的不利条件主要有两个：房地产和出口。这两大领域近年来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拖累因素。因此，能否稳住房地产市场，确保供给稳定、需求增长、房价平稳，对于今年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从中长期看，要推动房地产繁荣走向科技创新强国，但短期我们还需要房地产稳经济，经济转型是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不能说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就不要了。

至于出口，它更多是个外部变量，我们可控的因素相对较少，其表现有可能会低于预期。从 1-2 月的数据看，当年同比

和两年平均增速都超出预期，环比好于季节性，看似表现不错，但考虑到全球经济下行之势、全球大选年的不确定性以及地缘冲突风险上升等因素，全年的出口仍面临较大压力。

综上，基建和设备更新是今年的经济支撑，而房地产和出口则是不容忽视的不利因素。

卢锋：考虑到前两年平均增速是4.1%，今年要实现5%目标确实仍有一定挑战性。不过从中国潜在增速估计来看，这个目标可能仍低于潜在增速，经济增长仍有潜力可挖。

从国际环境来看，目前经济形势相对平稳，IMF年初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还略有上调。然而经济增长面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经贸环境复杂化，特别是美国大选年带来不确定性，这些都可能成为增长

的制约因素。

我早先曾提出我国经济增长特点是“宏观调控稳定，改革上台阶”，这个观察对目前可能仍未失效。当我们谈论今年的有利条件时，我认为政策的有效修复是关键。特别是房地产领域，如果政策决心更大，能够有效弥补这一短板，不仅会对投资形成支撑，还会极大地推动相关上下游的消费。当然，政策能否迅速调整，确实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今年增长有利条件可能是监管政策相对温和，修复力度可能会逐步加大。这也反映了近年来经济表现与政策干预效果之间的关系。同时，改革依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近期媒体和学界对改革的讨论趋于热烈，如果能在下一届的三中全会上实现重大改革政策的系统性突破，中国经济有望实现更为显著的增长。当然，也要看到多方面制约条件，避免过度乐观。

王贤青：徐高老师之前也提到过房地产市场的困境。在您看来，我们在改善房地产市场方面，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加强或改进？

徐高：根据最新数据，30 城市的周度销售面积下滑幅度依然显著，目前地产销售面积远低于过去三年同期水平。我认为，当前政策并未准确抓住问题的核心。两年前我们就指出，地产行业的主要矛盾在于融资紧缩导致的开发商信用风险高起。信用风险上升使得购房者信心不足，期房销售大幅下降，进而形成恶性循环。过去需求端的刺激政策效果有限，因为消费者更关心的是开发商的稳健性而非利率微调。

我认为，当前最需要的是普惠性救助地产开发商。仅仅救助项目是不够的，因为开发商若无法稳定，问题项目只会越来越多。虽然有人对救助开发商持保留态度，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房价高涨反映的是地

产供不应求，而开发商是这一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在融资紧缩政策下，地产新开工面积已大幅收缩，这对未来房价控制构成了巨大挑战。因此，我认为地产行业是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点，而开发商的信用风险则是其核心问题。目前的政策尚未触及这一核心。数据显示，地产行业下滑趋势依然明显，给经济带来压力依然巨大。

考虑到去年一季度经济基数较高，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速可能会下降。如果不在地产行业采取果断措施，如调整融资政策并用公共资金救助开发商，实现今年5%的增长目标将面临不小的压力。

王贤青：罗老师提到今年的财政可用资金相比去年增加了3万多亿，那么在您看来，这些资金应该如何更理想地配置和使用？

罗志恒：首先，针对房地产问题，我

再补充一下，我认为保供给和促需求是并行不悖的。去年房地产销售负增长8%，但实际上现房销售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说明，只要我们能确保房屋供应没有烂尾，消费者是愿意购买的。在促需求方面，除了传统的利率手段，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入手。例如，在一线城市的核心地段推出高品质商品房，这类购房需求很旺盛。同时，考虑适度调整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仍然存在的一些限制性政策，由于当前供需形势和预期已经改变，不用担心房价会暴涨的问题；还可以根据居民在城市中的工作年限或社保缴纳年限，开放部分新增购房资格，要释放出增量需求。此外，对房地产相关的税费成本进行合理调整也是必要的。从政策出台的节奏来看，要尽快优化房地产政策，政策能早出就早出，应出尽出，要逐步扭转预期。越早出台，越容易打消购房者的观望情绪，否则购房

者观望的过程越长，卖方也就越多，供需将更加失衡，导致市场迟迟难以出清。当然，我相信在一系列政策的优化和落实下，我们能够逐步稳定房地产市场。

回到财政资金的配置问题，今年预计的财政支出为 28 万亿。在经济下行期，我认为要讨论政策的有效性，要让有限的子弹发挥出更大的效果。其一，财政政策应当以支出政策为主、收入政策为辅。支出政策应占据主导地位，而收入政策如减税降费应作为辅助。因为单纯的减税降费可能无法有效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反而可能导致债务增加和风险上升；而财政支出将能够扩大总需求，增加企业收入或者居民收入，进而带动经济循环。其二，在支出方向上，我们可以逐步从以投资为主转向投资与消费并重的格局。例如，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同时，我们还

应将资金用于支持新质生产力的领域，如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贴息等针对支出端的支持措施，以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

徐高：我补充一点。当前地产市场面临短期房价下跌的巨大压力，商品房待售面积接近 7 亿平方米，市场供过于求，但这并非常态。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开发商信用风险导致地产销售大幅下滑，但需求并未消失，只是暂时被抑制；二是地产完工面积保持高位，开发商为回笼资金而加快完工，进一步加剧了短期供需失衡。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地产新开工面积已大幅收缩至之前的三分之一。而被抑制的需求早晚会释放，因此未来地产市场供需矛盾有可能逆转。从供过于求变为供不应求时，房价上涨压力将显著增大。因为房屋建设需要时间，无法迅速满足市场需求。

因此，当前的地产政策并在短期内未能有效解决市场问题，而中长期房价上涨的压力也在集聚。地产行业亟待有效政策来化解风险。

王贤青：接下来想请教卢老师，您之前提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这确实值得我们警惕。但在产业或管理上，有时产能过剩也会促使一些特别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因为在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的环境下，这些企业能更好地控制成本，提高创新能力。那么，您认为什么样的产能过剩可以被视为良性的呢？

卢锋：今天没有全面讨论产能过剩涉及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而是侧重就目前表现和特点、尤其是对外部经贸环境影响做了初步讨论。我在新世纪初年曾在 CEO 和其它场合专门讨论过当时的产能过剩形势和治理措施。产能过剩确实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比如有助于行业整合和优胜劣汰

从而推动行业的成长，同时过剩伴随的降价对消费者而言也是一种福利。然而，如果多个部门都出现产能过剩，这可能意味着资源配置在某种程度上偏离有效状态，因此仍是一个需要关注和适当范围的问题。

另外，考虑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有约 30% 的份额，如果出现显著的产能过剩，难免会产生一些外溢作用。这些影响可能会通过经贸关系的复杂性反过来对我们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应对产能过剩问题时，我们需要同时考虑其正面功能和负面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平衡和应对。

听众提问：关于产能过剩的问题，我想进一步请教卢锋老师。当前，地方政府的区域性竞争似乎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现象。比如，去年我们统计到有七八个城市都号称要打造锂电池都市。此外，各地在 ChatGPT 出现之前纷纷建设智能算力中

心，但随后由于赛道选择不当，导致大量投资浪费。这种现象似乎源于地方政府在规划前的盲目竞争和重复布局。那么，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该如何避免类似的问题？如何更好地进行区域规划，或者通过区域合作来优化资源配置？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否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又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依赖市场竞争，而让政府仅进行有限的规划和参与？

卢锋：这个问题也有重要现实意义。地方政府在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或产能扩张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会如何变化，都是在研究产能过剩问题时需要重点关注和分析的议题。

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产业政策经历了不断的创新与调整。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产业基金的方式来推动某些我们认为需要发展的短板行业。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发挥了作用，

但地方政府在总量上的投入更为显著。以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芯片等行业为例，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地方干预比较好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存在投资效果不佳和不成功的情况。从背景分析的角度来看，产能过剩往往源于前期投资过高或过快，因此如何认识地方政府的作用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认为，这里存在两种调节机制。首先，即使没有产能过剩，投资的成败也会有一个自然的淘汰过程。有些地区的投资能够收回成本并获得收益，对当地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而有些地区则可能面临血本无归的风险。这种自我淘汰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地方政府干预的一种限制。然而，当出现产能过剩时，问题就更为严重。即使微观投资成功，但行业形势的变化仍可能导致问题。因此，对于地方政府的产业基金投资，我们需保持审慎态度。

其次，政府投资也还是存在一些常有

的机制性制约因素，如使用公共部门资金进行投资时可能存在的激励机制问题。虽然不排除通过学习和实践，地方政府官员能够取得进步对传统偏颇有所矫正，从而增加成功案例的几率。然而总体而言情况到底如何，我觉得还是需要比较系统的经验研究，仍需保持谨慎。

因此，我们需要总结经验，并推动市场化改革。正如罗志恒教授刚才提到的，政府应明确界定其职能。在某些特定阶段，政府的干预可能是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更多的决策和行动应交给市场和优秀的企业来承担。这样，我们才能更有效地避免产能过剩的问题，并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听众提问：我想请教在新兴产业领域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问题。目前，商业航空航天等领域仍对民营企业设有一定门槛，尽管政府工作报告已明确提出要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卢老师认为应如何在新

兴产业上进一步向民企开放？

卢锋：关于市场准入，我认为应当尽可能地开放。回想起新世纪初年，那时政策面重视产能过剩目的之一是要限制投资、尤其是限制民营企业的投资。对此我持有不同看法并就此做了一些讨论。十几年过去了，在放宽准入方面我们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是仍然存在进一步放松投资限制。毕竟我国制造业已经对外资基本开放了，对本国民营企业应该开放度更高才合理，才能避免逆向国民待遇偏颇？我感觉官方对这一问题看法与二十年前也已有了显著进步。即便像航天部门这样的特殊领域，我们也可以借鉴特斯拉等企业经验，尝试对更充分调动民营企业积极性。今天形势下我们显然应该对民营企业抱有更多信心。这有助于提振信心进一步提升供给活力，同时也能促进需求应对当前需求不足困难。

听众提问：请教卢老师。首先，关于

全球产能过剩的成因，您提到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产业政策变化，包括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政策。我想知道，您认为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加剧了当前的产能过剩现象？或者说，它们的影响是否才刚刚开始显现，未来可能还有更大的冲击？其次，与几年前的中美贸易战相比，当前美欧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情况似乎更为复杂。那时候主要手段是关税，但现在可能涉及更多的非关税措施。您认为如果美国真的把目光盯向中国的“新三样”出口，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这对中国外贸将产生怎样的冲击？

卢锋：关于产能过剩的影响及其量化问题，确实需要分部门深入讨论。美西方产业政策的调整，包括美国国内及其盟国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增加在岸、近岸和友岸投资，都对近年某些部门产能增加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一点在芯片产能扩张方面表

现得比较明显，在新能源领域也有某种表现。

供给扩张相联系的贸易平衡形势变化可能会造成对外经贸关系的新紧张点，欧盟借助反补贴机制对我新能源车发难是动向之一。例如，近期有美国政客指出，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实际上助长了中国的产业转移。尽管美墨加协定中有针对中国出口的专门条款，现在看来也未能完全挡住更有性价比中国商品的流通。美国后续是否会采取追加措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去年底，我在文章中提及中国通过直接投资绕开贸易摩擦或贸易壁垒的策略。在第三国投资后，出口行为不再被视为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而是第三国对美国的出口。然而，如果新一轮产能过剩进一步发展，我国出口竞争力进一步提升背景下，美西方是否会寻求对我国这类直接投资采取更加超乎常理的限制措施也是一个

问题。美国国会专门小组去年底在对华政策重置报告中提出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极端主张，大选年特朗普提出极为夸张的关税保护措施，与产能过剩和贸易平衡新动态，显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对此需适当关注和分析并提前未雨绸缪。

王贤青：对于个人投资者或企业家而言，罗老师认为 2024 年最应该关注哪些投资领域？

罗志恒：我先补充下前面关于产能过剩问题的一些观察，这些年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概念叫“股权财政”，就是政府成立引导基金然后孵化一些高科技企业，不仅发展了产业，而且还能通过退出赚一笔。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我觉得不能贸然全国推广，否则将会一地鸡毛和产能过剩。因此这种模式并没有解决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财政资金的低风险偏好与高科技行业

的高风险特征的矛盾，同时这种模式还依赖于政府部门高度敏锐的市场意识以及相应的尽职尽责制度等等；不是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应的产业资源；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相关的人力资源，市场一定会比政府更好地识别投资机会。同时，“股权财政”这个概念似是而非，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除了依赖政治权力取得的税收外，天然地可以凭借产权取得收入，如果将上面这种模式作为股权财政，那土地出让收入算不算股权财政？当然算，是政府产权的变现，那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算不算股权财政？当然算，是政府产权的利润上缴分红。所以要谨慎看来这个概念和这个模式。

现在我回答王老师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还是资本市场，都涉及到众多的部门和因素。关于房地产市场，之前已经有过讨论，我现在主要谈谈资本市场的情况。

我认为，这一轮资本市场的上涨主要是由于人事变动引发的政策预期。通常情况下，春节后以及一二月份经济数据公布前，市场都会有所谓的行情“春季躁动”。为何在这个期间一般会有上涨？由于1-2月的经济数据在这个阶段尚未公布，但由于商业银行等将信贷靠前发力，所以金融数据还可以，这让大家觉得经济似乎在好转。同时，离3月份的数据公布还有一段时间，又在两会的档口，这就给了市场讲故事的空间。这就是市场卖方研究经常提及的“春季躁动”效应。

至于资本市场的涨跌，我暂时不发表看法。但我认为，要让资本市场行稳致远并增强其内在稳定性，我们需要进行一些制度层面的改革。

首先，优质的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础。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畅通公司进入市场的渠道，并完善退市制度，确保

不良公司被淘汰，留下好的公司。

其次，我们要加强分红力度，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分红方面与日本、美国相比还有差距，通过增加分红可以提升其吸引力。

此外，我们还要引入更多的中长期资金，这需要改革对中长期资金的年度考核机制，并进一步完善金融工具。

最后，我们要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的成本，以确保留在资本市场的企业以及信息披露的完整性，通过严刑峻法让成本收益更加匹配，让企业、中介机构不敢造假，市场风清气正、定价合理。通过这些改革，资本市场将更有可能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目标，即增强其内生稳定性，这样资本市场才能实现“长牛慢牛”。

02.

产业观察

编者按：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24年4月，北大国发院与和讯网联合主办的“新经济公开课”系列论坛首期聚焦“数字经济前沿探索与实践”，邀请学界和业界专家共同探讨数字经济的未来趋势、挑战与机遇，分享成功案例与经验，为行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本期“产业观察”栏目的第一篇文章，北大国发院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黄益平教授围绕“数字经济的新征程”主题，阐述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机遇与挑战。

第二和第三篇文章是来自业界的实践经验总结，阿里云智能集团副总裁、阿里云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安筱鹏详述了 AI 大模型重构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五种模式，以及未来发展所需的市场环境；用友集团副总裁张月强讲解了数智化重新定义企业创新的五个层面。



黄益平：中国经济的新阶段与数字经济的新征程

安筱鹏：AI 大模型重构产业竞争力的五种模式

张月强：数智化如何重新定义企业创新？



黄益平⁹：中国经济的新阶段与数字经济的新征程

我国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数字经济会在经济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怎样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与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其中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和问题，希望与大家研讨。

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重要变化是什么？

为什么数字经济诞生在当今这个时代？原因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了数字技术的大发展，数字技术更加广泛地应用到经济中，形成了新的经济形态。

9. 黄益平：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今天为何显得尤为重要？推荐大家参考《中国 2049》一书，这是北大国发院和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共同研究成果，主要内容是中国到 2049 年，即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之后走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这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状态、挑战和应对之策将如何变化。

根据中美两国智库专家的共同研究，有两方面的变化非常值得重视。

1、成本水平提高，低成本优势不再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人均 GDP 约为 200 美元，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最贫穷意味着经济落后，但由此带来的一项优势是要素成本很低。只要质量过关，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一定会有竞争力，这就是低成本的优势。现在我国人均 GDP 很快要逼近世界银行

所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13000 美元，这既意味着我们收入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改善，也意味着成本优势消减。

人均 GDP 从 200 美元飙升到 13000 美元，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什么样的挑战？过去有很多中国产品畅销国际市场，比如服装、旅游产品、低端制造业产品，包括电子产品等。现在这些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国际市场上已不见踪影。毕竟在人均 GDP 只有 200 美元时，绝大多数产品在低成本优势加持下都会竞争力拉满。现在低成本优势不再，产品失去竞争力的同时也失去市场。在此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挑战不言而喻，只有做出更好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进一步提高效率，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拥有竞争力。

2、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过去常讲中国的人口红利，主要是指

劳动人口在总人口结构中的占比不断上升，这意味着整个人口的生产率在不断提高。过去得益于人口红利，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快速发展，人口结构的良性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我国人口已步入快速老龄化阶段，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劳动人口减少。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有多严重？我想引用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的观点。几个月前他在国发院“央行行长系列讲座”中担任其中一期的主讲人。他表示，从1990年到2020年，这段时期就是人们常说的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在此期间，日本GDP增速很慢，特别是与七国集团内其他国家同时期的发展速度相比，日本最慢。但如果把这时期日本的GDP转化为劳均GDP（每个劳动人口创造的GDP），再与七国集团其他国家同时期的劳均GDP相比，日本反倒是增长最快的。因此白川

方明得出结论，“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经济的问题不是缺乏活力，而是缺乏劳动人口。在这几十年间，日本的劳动人口不断减少，尽管每一个劳动力的效率在快速提高，人均创造的 GDP 高于欧美国家劳动力，但依旧无法对冲劳动力数量骤降带来的 GDP 减量效应，使经济整体上看起来增长乏力。

要素成本上升与老龄化的挑战相互叠加，意味着如果我国不能大幅提升效率，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滑，甚至快速下滑。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学者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关注总要素生产率，即在给定投入（包括劳动和资本）的情况下，总要素生产率高意味着可以产出很多的产品；总要素生产率很低则意味着投入产出比不高。无论是高质量发展还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都

要大幅提升总要素生产率。而想要提高总要素生产率，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创新。

数字经济新征程“新”在哪里？

数字经济并不是全新的经济形态，在中国也已经有过多年的发展。在中国经济面临成本优势减退和人口老龄化两大挑战的同时，数字经济因为技术新、产业新，反而获得了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新动能。但经历疫情期间的加速发展和一段时间的强化监管治理之后，尤其是这两年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数字经济也面临新的征程。

1、数字经济的新机会

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已经驶入新阶段，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的，与过去改革开放几十年间我们遭遇的问题大不相同。正因如此，数字经济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前

所未有的机会。

当年，日本因劳动人口减少导致“失去的三十年”，今天我们数字技术中的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形态，或许可以在劳动力人口减少的背景下，帮助我们继续提高经济效率。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弥补劳动力不足带来的挑战，或许可以为我国提供当年日本不曾享有的机会，即便是劳动力减少，产出可能不会下降太快。《中国 2049》的一章中做过专门分析，认为机器人可以抵消劳动人口减少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根据 2022 年的数据，中国组装的机器人数量已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所有机器人数量的总和，这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来弥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

新技术也可以提高效率，甚至是解决成本提高带来的难题。比如塑料材质的一

次性打火机，随着产地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其生产线先后从日本转移到我国温州，又转移到湖南。打火机虽小但其包含的产业链非常复杂，有 16 个大小零件，因此转移生产线不容易。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湖南的打火机制造商把成本压到了每个 3 分钱左右，既解决了成本提高的难题，也暂时免去了再度迁移生产线的烦扰。这也是数字技术帮助化解成本压力的一个范例。

2、数字经济的新挑战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数字经济发展最好的两个经济体，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中国。在数字经济市场规模、独角兽公司数量、关键领域技术水平等方面，中美两国在全球领跑。

与美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还有差距。我国数字经济的应用做得更好，但原创技术水平相对滞后。比如电商、短

视频平台、移动支付等，这些技术虽然不是中国原创，但我们能在 14 亿人口的大国推广开来，也很了不起。

过去我们常说，中国的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原因是规模做得大但原创技术相对较少，也没有使用前沿技术。这些年我国一直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归根结底，要提高总要素生产率，必须要依靠数字经济。

一般而言，数字经济有两类，即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指的是，大数据分析、互联网、相关硬件等数字化新兴行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大。产业数字化是用新技术来改造促进传统经济活动，其规模可能更大。

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研究数字金融问题，中国的数字金融已经取得不少突破性的成就。比如中国的移动支付在规模、效率、

安全性等指标上国际领先。大科技信贷平台利用大数据和平台获客做信用风险评估，不仅能触达传统金融机构很难触达的客户，还能为之做有效的信用风险评估，据此发放贷款。因此，在推广普惠金融方面，数字技术功不可没。

数字金融里还有很多问题未能完全解决，智能投顾问题就是其一。能否通过数字技术为一般的中产阶层提供类似于私人银行一样的投资理财服务？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实践还不是很成功，是值得努力的新空间。

最近大家抱怨比较多的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不足。在我看来，具体有两点：一是融资难，二是投资难。中小企业融资难，指的是一般的中小企业从银行借钱难。我认为大科技信贷可以为此提供解决方案或思路。无论是大科技公司还是传统银行，只要有触达手段，有数据可分析，都可以

帮助中小企业做信贷。

在解决投资难方面，数字技术的实践还有待突破。很多老百姓手中有钱，但不知道该投向何处。这不仅涉及投资服务，投资市场自身的结构也有待改进。目前在一些关键领域已经出现较大突破，我们也期待在其他领域也能取得突破。

在数字互联网领域，目前我国做得比较好的都是消费互联网。在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做得成规模、有影响的企业很少，值得成为数字经济下一步的发展目标。

到目前为止，我国数字经济企业绝大部分还在境内发展，美国的数字经济企业有很多世界级公司，这也值得我们学习并赶超。

通过近几年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到中国数字经济在国际上的领先优势正在减退，与最强者的差距有逐渐拉大

之势。这背后的原因很多，与近些年我国对数字经济的整治、中美地缘政治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倘若与领先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对我们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造成很大压力。在我们身后也有许多国家紧追不舍，我们必须紧跟领先国家的脚步快速发展，否则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压力会更大。

未来的三大挑战

1、如何加强技术的原创性？

2022 年，伦敦政经学院的两位学者曾专门比较和总结欧洲、日本、美国和中国的数字技术，包括前沿技术和创新技术的进展，发现从数量上看，中国数字经济的成果在短时间内就超越了欧洲和日本，在个别领域甚至超越了美国；从质量上看，中国数字经济的成色与美国尚有较大差距，在某些领域甚至差距不断拉大。

最近人工智能技术不断爆出颠覆性的成果，频率之高、速度之快让中美在这一领域的差距再次拉大，而且原本第二的位置岌岌可危。

我们需要深思：我国真正的创新能力在哪里？科技原创还有没有机会？需要怎么做才能迎头赶上？这些问题都与国家的创新能力有关，值得高度关注。

我经常引用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由两大类因素决定，第一类是对研发活动的投入，包括科研人员的配备和研发资金的投入等；第二类更重要，是研发的总要素生产率水平，即研发投入产出比。

哪些因素可能影响研发效率？迈克尔·波特通过研究认为有很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点：

(1) 知识产权保护。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研发效率会受较大影响。

(2) 国家开放度。当前我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国家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在诸如美国“小院高墙”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开放度对创新而言格外重要，固步自封难以保持高水平的创新。

(3) 民营部门的活力。我国有 70% 的创新源自民营企业的贡献。目前美国的人均 GDP 是我国的四到五倍，因此，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强于我国。不过从动态的角度看，我国要有意识地缩小这种差距，其中关键点之一就是提升民营企业的活力和能力。

2、什么样的监管最合适？

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形态会带来新的创造力，自然也会产生

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和做法，对此监管很正常。监管的目的是在活力和稳健之间找平衡，既要保持活力，又要提高效率，更要兼顾平稳和公平。监管如果太紧会影响活力；反之放任自流会影响规范。如何做到较好的平衡点，对监管的挑战很大。

比如，人工智能大概率会带来很多便利，同时也存在很多潜在的问题和风险。监管首先要考虑权益保护的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在调用数据时有没有侵犯个人隐私？其次是算法问题。算法是否对每个人都公平？有没有出现大数据杀熟的情况？如果算法无法一碗水端平，那可能会造成黑箱，引发更多不公平的现象。这既可能成为问题，也可能成为风险。我们的监管方案正尝试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尚未找到成熟的方案。

另外，数字技术、平台经济、范围经济本身就具有世界性，仅在特定区域或一

国范围内发展并非理想状态。一旦数字经济跨出国门，该如何落实监管？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所有的监管都要在效率和稳定之间找平衡，但如何权衡效率和稳定，各国的观点见仁见智，使用的技术手段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各国该如何展开合作？如何在坚守本国监管底线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的灵活度，同时避免负面的外生溢出效应？值得深入探讨。

3、如何核算数字经济对总要素生产率的真实影响？

这是经济学研究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本世纪以来，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生产、社会治理等诸多方面。多领域的效率提升和便利度提升明显，但很难看清总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发展数字经济不止是提升民众福利，还必须考虑

到对总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贡献，但对此尚未找到准确的核算方式？关于这个问题存在各种解释，至今未有定论。

有观点认为，总要素生产率主要看投入产出比，对传统的经济部门而言，无论是投入和产出都有实打实的数据，但数字经济则不然。比如，农民使用数字技术节省了劳动时间，但实际产出可能没有太大变化。这就可能出现农民对效率提高有获得感，但农民节省下来的闲暇时间以及其他一些积极的变量不计入产出，使整体的总要素生产率提升不明显，甚至看不出来。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技术投入对经济和生产率的正面影响往往有滞后性，不会立竿见影，也许要等待多年。最近有几位美国学者表示，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和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在美国已经初步显现，但仍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经济学研究文献。

在我看来，科技改变生活没错，但到底改变了多少，带来了多少便利，存在典型的经济学问题。如何准确度量数字经济的真实影响，需要认真探讨和研究。如果数字经济的正面影响能在总要素正产率上有所体现并得以准确度量，或将为我们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供更多的鼓舞。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安筱鹏¹⁰：AI 大模型重构产业竞争力的五种模式

谈到数字经济和 AI 产业发展，我们必须关注 AI 大模型对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新定义。ChatGPT、Sora 等 AI 大模型的问世展示了技术进步和广泛应用的多重角度，表明 AI 大模型不仅代表着技术创新，更象征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

以英伟达为例，其市值在短短几天内迅速增长，从 1 万亿美元飙升至 2 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凸显了智能科技领域的巨大潜力。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增长，更意味着智能时代的来临。

10. 安筱鹏：阿里云智能集团副总裁、阿里云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根据其演讲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2023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5月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关于人工智能用有三个“第一次”——第一次提出“通用人工智能”，第一次提出“产业智能化”，第一次明确“把握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同年6月1日，中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在《人民日报》发文，对人工智能在产业体系中的关键作用进行评估。他指出，产业体系的智能化已成为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必然要求；通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等前沿技术领域正在发生革命性突破；产业体系能否实现智能化转型，关系到未来国际竞争的成败。

这里的“革命性”体现在三场重要革命：

首先是人机交互革命，涵盖了从物理设备、软件编程、图形界面交互到自然语言对话交互的全方位发展；

其次是认知协作革命，AI 大模型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最短路径，颠覆了传统的学习和实践方式；

最后是计算范式革命，从以 CPU 为主导向以 GPU 为核心的 AI 计算体系迁移，这一变革将深刻影响计算领域的各个方面，从服务器到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各类产品。

如果说 ChatGPT 是美国数字创新森林中的一片叶子，Sora 则是另一片叶子。在当前的创新浪潮中，我们不能只关注美国数字创新中的这两个明星项目，而应更广泛地思考整个生态系统。我们需要了解整棵树的形态、树根的状况、土壤的特性以及整个森林的面貌，才能找到中美创新缩小差距的科学路径。

整棵树的形态如何？为什么美国在 AI 大模型领域引领全球？主要有五个关键因素：

1. 基础理论突破，比如 2017 年谷歌发表的 Transformer 文章；
2. 硬件技术进步，例如芯片算力效率提升与门槛降低，GPU 的普及和云计算的推广降低了训练成本；
3. 云计算产业的发展，促使大规模计算成本降低；
4. 互联网为 AI 大模型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工具、人才和场景；
5. 开源、开放的生态环境，对于 AI 大模型的推广至关重要，也决定了 AI 大模型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未来三年哪些产业的竞争力将被重新定义？首先是高敏感行业，如手机、电脑、汽车、人形机器人、游戏等将迎来新的挑战 and 机遇；其次是中敏感行业，如证券保险、家用机器人、文旅等

也将面临变革；最后是低敏感行业，如能源化工、银行和消费零售等竞争力与 AI 大模型关系相对较小，取决于牌照等其他因素，但也不排除面临变革的可能性。

探讨 AI 大模型如何重新定义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时，我们可以从五种模式来理解。

1. 产品竞争力的升级，
2. 创新效率的巨大变革，
3. AI 原生产业的兴起，
4. 企业内部组织流程与决策的优化，
5. 生产力工具的再造。

模式一：产品竞争力升级——重新定义终端智能化水平

2024 年 1 月份在美国举办了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产品展，尽管它一直以来都是

一个全球著名的消费电子产品展，但它今年的核心关键词是 AI。这次展出的各种产品如 PC、手机、汽车、智能家电、可穿戴设备等都与 AI 大模型技术完美结合。此外，中国手机产业目前占据全球市场的 67%，中国智能汽车和电动汽车产量也占据全球的 60% 以上，而这些产业正在不断将大模型技术融入产品功能体系中，推动产业发展和竞争力提升。

对此，我有几个判断。

1. AI 手机将成为继功能机、智能手机之后，手机行业的第三阶段。

2. 我们不知道 AI 会给手机增加多少新功能，但我们知道没有 AI 大模型驱动的手机会在市场消失；

3. 2024 年是“具车智能”元年，“具车智能”一定会发生在“具身智能”之前，会首先诞生在中国车企，而强大的基础模

型是具车智能的关键。

4. 模型上机并与云端协同将成为智能终端大模型商业化的重要形态，AI 开源大模型的重要性进一步突显。

模式二：创新效率变革——研发范式的跃迁

AI 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应用正在重新定义研发范式，为产业带来变革。

以英伟达为例，他们是第一批受益于 AI 技术的公司之一。每隔半年到一年，英伟达就会公布自己芯片设计方面的突破。其中一次，英伟达利用 AI 大模型支持 GPU 芯片设计，成功将芯片面积减少 25%，功耗优化。AI 与芯片的 EDA 工具相互促进，这些 EDA 工具公司也与大模型深度融合。

在医疗和生物领域，2021 年的《科学

（Science）》杂志报道，在 AI 支持下，对蛋白质结构的预测取得巨大突破。到 2022 年底，Alpha Fold2 模型已预测了 2.2 亿种蛋白质结构，覆盖 DNA 数据库所有已知生物体的蛋白质。在生物研究领域，原本需要大量博士研究生人员进行专利分析。而今天，AI 大模型在 10 分钟内完成的任务相当于两名博士一周的工作量，且效率和质量可能更高。

AI 对于创新同样意义重大。马斯克在去年 9 月 2 日展示的自动驾驶技术吸引了全球 1200 万人关注。他展示了 FSD V12 版本相较于 V11 版本的本质区别。V11 版本的训练方式是通过图像标注和规则来实现，例如红灯停。过去，这需要写入 30 万行代码才能完成。而 V12 版本则通过学习海量图片和视频数据，仅用近两千行代码结合大模型和 Transformer 模型构建而成。特斯拉车友在春节前后免费体验 V12 版本

后，发现无人驾驶训练方式已经革命。

在材料科学和医疗科学领域，AI 创新也带来了巨大影响。材料科学作为近代工业的重要领域，其研发方式正在发生转变，从过去的理论计算到高通量计算再到人工智能推理。如 Google 利用人工智能模型找到了 38 万个热力学稳定的晶体材料，极大加快了发现新材料的速度；微软从 3200 万种无机材料中筛选出了一种全固态电解质材料。在医疗科学方面，阿里与中山大学的合作研究使得 RNA 病毒研究取得突破，缩短了艾滋病毒、新冠病毒等测试周期，并发现了传统无法识别的最大规模 RNA 病毒。

AGI（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为人们带来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的迭代升级，包括从理论推理（如牛顿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实验验证（如爱迪生发明灯泡）、模拟择优（如波音 777 研发周期缩短），

到如今 AGI（AI4S：生物、航天、化工）的应用。关于 AGI、AI 大模型和二三十年前数字孪生的区别，主要在于当时波音 777 开发时，机理清晰且输入输出具有确定性；而今天的 AI 大模型仍处于探索阶段，机理尚未完全清晰。即使如今科学家们也未能完全解释背后的机理，但这并不妨碍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模式三：AI 原生产业兴起

AI 催生了一些原生产业。在互联网时代，Google 等公司解决了信息流转与匹配问题，缓解了信息不对称。AI 原生产品是基于 AI 大模型，没有这些大模型就无法实现这样的场景。这些企业的竞争力来自于 AI 驱动的业务体系，解决了高效决策问题，找到了从问题到答案的最短路径。

例如，Google 研发的机器人大模型 RT-2，让机器人通过 AI 大模型学习新技

能，成功完成了“捡起桌上灭绝的动物（玩偶）”的任务。Open AI 的人形机器人接入 ChatGPT 后获得惊人能力。当人类发出“可以给我一些吃的吗？”的指令后，这些机器人展现出了理解能力、分析能力、规划调度能力和执行能力。机器人首先通过理解能力理解指令“什么是可以吃的东西”；接着通过分析能力判断桌子上哪些物品是可以被人类食用的；然后利用规划调度能力，用不同的手指抓取苹果和篮子；最终发挥执行能力，将苹果递给人类。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机器人只需要经过 12 天的训练就能够完成这一系列任务。

这里想要传达的一个理念是，在当前发展趋势下，机器人已经搭载了强大的 AI 大模型，并经过各种测试，包括通用问答系统的开源版本质量也在逐步提升。然而，在很多机器人产品都搭载强大大脑的情况下，如果你的产品没有跟上，就很难在市

场上保持竞争力。因此，大模型已经成为定义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举例来说，现在一些机器人产品能够简化客户使用流程。客户只需简单的指令和参数，即可让机器人完成复杂的动作，而无需高级技术人员投入一周时间进行操作。这种便捷性将成为未来所有机器人产品的标配，也是构成它们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随着大模型的不断涌现，预计会出现更多的 AI 独角兽企业。美国已经涌现出许多这样的企业，这也将推动 AI 原生企业的发展。

模式四：流程与决策优化——对外体验升级与对内自动化决策

AI 技术可以优化企业内部的决策流程，提升用户体验，并加快决策自动化的效率。

《美国医学会杂志》在 GPT4 问世初期进行了一项实验，让一组病人分别咨询真实

医生和 GPT 医生，结果显示，在面对病人咨询时，ChatGPT 医生获得了比人类医生高出 4 倍的好评。此外，在同情心指标方面，GPT4 获得了 45% 的肯定，而人类医生仅有 4.6%。想象一下，作为一名医生，中午 12 点时你已经看了 30 个病人，门口还有 8 个病人等待就诊，你还需要赶时间去吃饭。这种工作压力可能会影响你的心情和工作效率。

AI 大模型正在重构各种软件系统，重新定义客户体验，并提供个性化服务和规模化供给。例如手机应用程序如钉钉，PC 软件如 Office、Windows，以及企业应用软件如 ERP、CRM、MES 等，所有这些软件都将受益于大模型的重构，未来还将有更多场景适用于这种技术。

大模型技术在人机交互复杂系统自动化决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比如在电力调度等领域。当面临停电等问题时，

需要迅速解决各种复杂情况，而今天的大模型技术可以提供更佳的解决方案，为生产力工具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模式五：新生产力工具涌现——智能时代的工具革命

数字化带来了两场重要变革，即决策革命和工具革命。随着 AI 大模型的持续演进，生产工具得到进一步提升。

2023 年 4 月份 ChatGPT4 发布后，国内机构 CSDN 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ChatGPT4 的软件编程能力相当于中国月薪 3 万人民币的程序员水平。这意味着，如果你的工资低于这个水平，ChatGPT4 可能会取代你的岗位。ChatGPT 已经通过了谷歌编码 L3 级（入门级，年薪 18 万美元）工程师水平测试。

关于一家公司招聘高级程序员的讨论

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两位应聘者其中一位来自巴基斯坦，拥有 4 年经验，另一位来自德国，有 19 年经验。然而，借助 GPT4copilot 辅助编写代码，巴基斯坦工程师的效率相当于德国工程师的 5 倍，且成本仅为其 1/20。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种变化距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据悉，一家央企已表明，鉴于 AI 的编程能力，他们原本软件开发外包业务预算已从 6 亿元减至 3 亿元，因为 AI 技术已经能显著提高编程效率。

Sora 是一种具有生产力工具潜力的技术，正在对影视行业进行革新。3 月 6 日，好莱坞上映了电影《终结者 2》，该电影由 50 位 AI 技术工作者利用 Midjourney、Runway、Pika、Kaiber、Eleven Labs、ComfyUi、Adobe 等多个 AIGC 工具进行创作。

有人或许会认为 Sora 只是用于生成视

频而已。然而，王坚院士曾经说过一段经典的话：如果仅将 Sora 局限于可能影响短视频等行业，那我认为是对其极大的轻视，它的意义远超出此类应用。他肯定了技术本身的重要性。Sora 这种大型模型技术的重要意义在于，在数字世界中还原和再现物理事件，以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换句话说，如同在比特的世界中还原原子的运行轨道。当然，这需要其他技术的支持。

中国 AI 大模型的发展需要优化市场环境

最后，中国的创新需要采取一些关键举措。除了数字森林和数字基础设施，我们还需要关注中国 AI 大模型所面临的挑战。中国 AI 大模型的发展正面临两条道路：一条是像当初的移动互联网一样通过开放的学习实现超越，另一条是闭门造车导致加

拉帕格斯效应。

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本来很落后，是跟跑者，但在跟跑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开放学习，强化应用，不断迭代，最后实现很多细分领域的追赶甚至超越。

加拉帕戈斯效应源自达尔文在东太平洋群岛所观察到的现象，即某些物种在孤立的封闭环境中自我进化、迭代和演进，一旦离开这个环境就难以生存。类比到产业生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 SaaS 产业就面临类似的挑战。十年前，投资人对中国 SaaS 产业抱有很高期望，但如今中国的 SaaS 软件产业与 AI 四小龙一样，无法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与产业实力。

造成加拉帕戈斯效应的期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独特的市场环境，包括看似统一的市场，实则充满“碎片化”，看似公平的市场竞争，实则存在“关系化”，看

似丰富健康的市场生态，实则存在“盐碱化”等问题。比如，企业拥有许多子公司和孙子公司，导致市场高度碎片化。这种碎片化市场削弱了小企业孵化和成长的机会，也使得优秀产品和服务难以脱颖而出。

因此，我们需要优化市场环境，建立支持小微创新企业、突破性技术、优质产品和服务的筛选机制，着力解决市场的碎片化、关系化和盐碱化问题，为产业健康发展和创新突破创造良好的环境，为真正的创新者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

张月强¹¹：数智化如何重新定义企业创新？

我从企业数字化的角度分享一些实践经验和见解。在财务信息化的进程中，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用友开始更多地聚焦于服务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如何理解企业的数字化呢？我将从创新的角度探讨如何利用数字化重新定义企业创新，以及如何借助数字化的力量加速企业的数字化创新。

具体而言，今年“新质生产力”备受关注。从我们的视角来看，用友所处的领域正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之一。我理解的

11. 张月强：用友集团副总裁。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中国电子商会自主可控委员会副理事长杜宇对此演讲有重要贡献。

新质生产力，一方面体现在创新驱动上，另一方面则是以高质量发展为锚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正是我们追求投入产出更高效的目标。当收入增长或利润增长超过成本增长时，这便是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表现。因此，学会利用科技手段、智能技术以及数据资源，着力推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在高质量发展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变得更有意义。

从我们与诸多企业的实践来看，有五个方面的工作值得创新，分别是：产品创新、生产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以及组织管理创新。五大创新的背后有三个核心逻辑支撑：运营效率、决策效率和结构效率。

首先，通过生产的数字化和运营的数字化，能够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使企业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其次，决策效率是企业成功的关键。由于决策成本是企业的重要成本之一，因此，通过扁平化管理等方式，确保决策能够迅速而准确地传达至核心管理层，是提高决策效率的有效途径。

最后，结构效率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通过对比不同企业、竞争对手和产业，我们可以发现，在结构上更加优化的企业往往能够取得更快的发展速度。

总之，产品创新、生产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以及组织管理创新，都是在运营效率、决策效率和结构效率这三个逻辑框架下展开的。这些创新举措将共同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典范。

产品创新

在产品创新方面，众多企业正积极尝

试将 AI 应用融入生产流程中。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而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则仍需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部分企业已经成功地将 AI 技术应用于产业内部，涵盖了诸如穿戴设备等各个领域。

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应如何利用 AI 工具提供线上内容服务，特别是设备后续服务。以双良这家锅炉制造企业为例，大型设备在三包期结束后往往容易出现质量问题。这并非产品质量问题，而是由于用户在三包期后可能降低了维护保养的频率。一旦设备出现故障，原厂派人维修的成本往往十分高昂。针对这一问题，双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产品赛道，即从单纯的产品销售转向包括服务在内的综合销售。通过收集产品运营数据，双良能够准确掌握各个锅炉的运营状况，提前通知客户进行保养或维修，甚至实现远程处理。这种产品后服

务或销售后服务的模式，标志着双良从产品制造商向服务提供商的转型，与当年IBM的转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一创新不仅降低了维修成本，也提升了客户满意度，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生产创新

在探讨生产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人工智能在养猪业中的显著应用。以牧原这家领先的养猪企业为例，尽管外界普遍关注其养猪业务的规模，但牧原自己更强调其科技公司的定位。牧原通过科技手段实现了生产环节的全面无人化，广泛应用了数字化技术，包括智能排尘和智能配料等。此外，牧原还采用OCR技术识别蓝领工人的身份证，实现员工信息的自动化管理和排程。

与之类似，许多企业也在积极尝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例如，世界第二大单体

铜冶炼厂江铜贵冶利用新一代 MES 系统，实现了从经验判断到人工智能判断的转型，不再依赖过去的经验。济源钢铁则通过人工智能实现了废钢判级，通过安检机判断废钢的质量和数量，进而实现智能化的报价和配送。

此外，另一家养猪企业高金也通过数据加算法的创新，实现了饲料配比的精准计算和成本控制。高金利用 AI 算法预测每头猪所需的饲料量和销量，以及饲肉比等关键指标，有效应对了价格波动和生猪周期性波动的挑战。

这些案例充分展示了数字化在生产创新中的广泛应用。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企业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还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波动和周期性挑战。因此，数字化将成为未来生产创新的重要方向之一。同时，ESG 和双碳等理念在数字化生产创新中得到了践行，推动了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创新

市场创新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中国企业加速出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出海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初的产品出海，到资本输出，再到如今的人才和能力输出。这一转变使得企业在海外市场运营时需要更多地用全球化的视角思考问题，而不仅仅是站在中国视角看世界。

在全球化运营的过程中，企业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其中，合规性、资金管理、人才属地化以及企业文化的适应等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以某家企业为例，他们在出海过程中，对于组织发展与业务发展的优先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虽然业务发展，即市场拓展和盈利，是企业的重要目标，但组织发展同样至关重要，它涉及到合规

性、属地化管理等多个方面。

中国移动国际（CMI）在出海过程中，采取了一种有效的策略：减少外派人才，增加当地属地化的人才比例。这样做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融入当地市场，理解并遵守当地的法规、习俗和文化。同时，随着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企业在处理数据时也需要格外谨慎，确保数据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除了人才问题，资金管理也是出海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不同的会计准则、法规要求和资金监管要求都可能对企业的资金运作产生影响。因此，构建全球私库系统，实时监控全球多个资金账户的运转情况，确保资金的最大化应用，成为许多出海企业的必然选择。

市场拓展和市场创新不仅要求企业在海外建立稳固的运营基础，还意味着服务

体系需要与之相匹配。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包括用友在内的服务型企业也在积极拓展全球业务，从东南亚扩展到全球范围，以更好地支持中国企业的出海需求。

总之，市场创新是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优化人才配置、加强资金管理、提升服务体系等方式，企业可以更好地应对市场挑战，实现海外市场的成功拓展。

资源配置创新

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第四个创新，即资源配置创新，其核心在于如何将资源合理且优化地配置到更具意义的地方。

从产业互联网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众多企业正努力成为链主企业，通过整合上下产业链实现产业互联网的构建。这种

整合涵盖了供应链的整合，如餐饮企业设立中央厨房以优化配送体系。此外，一些物流企业也表现出强烈的变现需求，他们希望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利用自身完善的物流体系实现更多的盈利，这体现了供应链协同的概念。

以云南为例，农户在种植过程中常面临诸多困扰。例如，云南白药的主要原材料三七的种植，农户常因担心市场价格波动而犹豫不决。同时，由于信用问题，农户在贷款和购买农资时也面临诸多困难。因此，通过构建产业链和产业互联网，整合各方资源，可以为农户提供更为明确的市场信息和贷款渠道，从而提高种植效率和产出质量。

尽管许多企业已尝试应用产业互联网，但全要素生产率并未产生预期的价值。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许多企业在复制成功企业的商业模式和人才管理时，仅停留

在表面，未能深入理解和学习其背后的组织逻辑和能力。因此，在未来的资源配置创新中，我们不仅需要关注资源的整合和优化，更需要关注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能力，以实现真正的创新价值。

组织管理创新

这一过程引发了组织管理的创新思考。我们期望员工能够积极主动，管理能够智能高效且数据驱动，组织能够敏捷地适应商业模式的变革，同时实现资产的数字化，如同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融合趋势。

在此背景下，一家世界 500 强企业尝试将财务、人力、采购、营销、物流、法务、信息等七个业务职能共享化，以实现信息的充分流动与互联互通，最大化组织效率。这种共享模式打破了职能壁垒，提升了协同效率。

然而，人才管理的核心挑战在于人才的合理配置。人才错配不仅增加了成本，还可能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例如，请姚明送快递或升国旗虽然可能效率极高，但这显然不是其最佳的使用方式。因此，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人才的精准配置成为关键。以厦门航空为例，其通过数字化技术精准管理飞行成本，包括油料成本、飞行员和机组人员配比等，实现了成本优化。

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人才管理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企业，如徐工集团和中化，基于大模型进行人才的人工智能发现，通过算法和数据分析，精准匹配人才与岗位，避免人才错配。此外，人工智能还可应用于人才招聘，通过大模型综合考量应聘者的过往经历、性格测试等多个维度，从而预测其未来的绩效表现。

总之，组织管理创新是提升组织效能的关键。通过共享化、数字化和人工智能

等手段，我们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组织效率，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产品、生产、市场、资源配置还是组织这五个层面，我们均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的应用和经营效率的提升，推动整个产业的升级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手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数字化手段已经从最初的简单连接发展到如今的数据驱动，并进一步扩展到智能运营，如人机交互和智能人才发现等。以智能人才发现为例，仅需输入一段自然语言，如“某某员工要离职了，请推荐一个合适的人员”，系统便能根据数据分析推荐出合适的人选。

以上所总结的企业数字化的关键步骤，在实践中为众多企业提供了服务，并得到了验证。在验证过程中，我们重点关注了

财务、人力、供应链、采购、制作、营销、研发、项目、资产和协同等十个领域，致力于帮助企业提升数据驱动和智能运营水平，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需求。期待更多企业能够分享他们的案例，同时也渴望有更多机会为更多优秀企业提供服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03.

管理课堂

编者按：

本期的“管理课堂”栏目精选国发院管理学教授的两篇文章。

第一篇来自财经访谈节目《中国经济新动能》对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学教授、BiMBA 商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宫玉振教授的采访。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企业如何平衡长期主义与短期动荡，如何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企业面临的挑战有什么不同，企业一把手如何把个人意愿转变成组织意愿等关键管理问题，宫老师做了深度解析。



第二篇文章《战略是关于做强的学问》来自北大国发院助理教授侯宏。他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此前在国内高科技行业工作多年，因此在战略的理论与实践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

宫玉振：企业家应该保持一种适度悲观的乐观主义

侯宏：战略是关于做强的学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宫玉振¹²：企业家应该保持一种适度悲观的乐观主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企业如何制定战略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现在面临的环境，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环境的变化其实是一个结构性变化，包含几个变化因素：一方面，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在这个深度调整期就会出现地缘政治的变化，大国关系的变化，与此相关的是各国的政策会进行调整，对我们的商业环境也会构成很大的冲击。

12. 宫玉振：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学教授、BiMBA 商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另一方面，一场全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兴起，一个全新的 AGI（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到来，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时代，高度不确定的时代。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过去的战略就像登山，山是相对静止的，只需要定好目标，规划好路线，就可以开始攀登。中间可能会走错路，但是只要坚持攀登，大概率是可以登上去实现目标的。但是今天的战略环境更像冲浪，浪是一波一波的、是动态的。企业家必须接受一个现实，与过去相比，今天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基于相对稳定的战略环境所形成的决策模式、管理体系、管理理念正遭遇挑战。作为企业家来讲，最核心的就是要把握好变化和不变、长期和短期的关系。

企业战略的制定如何平衡长期主义与短期动荡

我们应该怎么理解长期主义。长期主义不是一根筋，长期主义也要应对眼前的生存和把握眼前的机会。长期主义强调的是在应对眼前生存和把握眼前机会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把握长远的大趋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长远追求。

越是在动荡的时代，眼光越要穿越动荡的周期，看清背后的大的趋势，从而超越短期主义的陷阱。常人关注风口，高手关注周期，更主要的是关注周期背后的趋势和规律。人类历史上有无数的大周期，历史总是周期性动荡的，但当我们拉长观察的时间维度的话，就会发现，历史在短期往往是波动的，但从长期来说它是一条相对平滑的线，你是可以看到大的趋势，以及总结出背后的规律的。

周期的背后是大的趋势，周期是不断波动的，但是大的趋势是相对明确的。而趋势的背后就是它的规律，这个社会根本的发展规律是没有改变的。把握住了规律，就可以分析出大的趋势，就可以去驾驭这种动荡的周期。我们可以知道现在处于周期的哪个节点，从容不迫地展开战略布局。这样一来虽然环境是动荡的，但是你的内心是有定力的，因为你看到了大的趋势和未来基本的规律。

所以越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越应该去思考那些趋势和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更好地把握现在所在的周期，以及我们所在的周期节点。

企业如何分辨顺境与逆境

在逆境和顺境之中，企业战略的目标是不同的。在形势有利的时候，企业要迅速发展，抓住机会扩张。但是形势不利的

时候，企业的目标就应该定位在保存自己，先活下来，活下来才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企业在顺境中应该保持危机意识。人性的特点就是当顺利的时候就很容易狂妄，狂妄就会容易导致判断出现问题。这种自大狂妄最后导致决策失误，失去最好的发展机会，甚至毁掉组织的例子太多了。《孙子兵法》里有一句话叫“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它要求企业决策者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考虑风险，然后考虑收益，这就是危机意识。我们经常讲，做好最坏的准备，才能争取到最好的可能。

逆境之中人性的特点就是，当逆境来临的时候，很多人会沮丧、彷徨、动摇，但企业领导者不能动摇。他们必须把信心传递给组织的每一个成员，这需要他们有强大的意志力。意志力的背后当然是信念，这就是作为企业领导者最关键的特质。《孙

《孙子兵法》中说道，“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一定要从利害辩证地去考虑；“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考虑到有利的因素，事情就很容易开始。整体不利的时候要让大家看到希望，但是整体顺利的时候要看到风险，把风险提前化解掉，这对企业领导者来说是很重要的特质。

对企业而言，冬季是最好的“练兵”机会，因为它的机会成本是不高的。行业里的机会都特别多的时候，放弃机会的成本特别高。但是当行业处于逆境的时候，机会成本就没有那么高。这时候企业应该把精力用在内部组织能力的建设方面，夯实管理的基础，迎接未来新机会的到来。这就需要耐心和耐力，要走出逆境，企业必须准备好打持久战，而持久战最核心的就是战略定力。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战略耐心，同时保持足够的毅力。

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是过于悲观，躺平、摆烂、抱怨，最后无能为力，这不是一个好的领导应该做的事情。第二个极端是过于乐观，认为春天马上就要到来，过于激进，开始投入，结果往往会被打得头破血流。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企业家应该保持一种适度悲观的乐观主义。一方面，一定要保持乐观主义，你永远可以相信否极泰来，相信所有的逆境都会过去。另一方面，还要适度悲观。所谓的适度悲观，是因为否极泰来是需要时间的，对此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适度悲观的乐观主义，是一种既现实、又积极的逆境生存策略。

企业一把手如何制定好的战略

企业所有的战略决策最终往往是由一把手来做出的决定，有句话叫“主将无能，累死三军”，企业一把手如何制定好的战

略？辛弃疾曾经讲过一句话，“谋贵众，断贵独”。“谋贵众”是指在制定战略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充分的开放性。因为一个人的认知总有局限，哪怕你是天才。在这个过程中多听取整个组织成员尤其是一线成员的意见就特别关键。重要的不是谁是对的，而是什么是对的。可以把制定战略的过程作为一个学习的过程，看作是整個组织上下互动和共创的过程。尤其当把一线员工的信息或建议纳入战略决策之中，形成方案，再交给一线去执行就会特别地顺，因为这个方案本来就是一线提出来的建议。

但是“谋贵众”并不意味着企业一把手可以放弃制定战略的责任，还要“断贵独”。“断贵独”，是指所有的意见汇总上来以后，企业一把手要做出最后的选择，并对这个决策的结果承担所有的责任，不能说这是下属的意见，是别人的意见，最

后推卸责任。谋的时候充分倾听，但是做决策的时候，企业一把手必须负起与此相关的所有责任，这叫“断贵独”，二者之间有这样一个平衡。这是好的战略往往具备的非常关键的两点。

在执行过程中，作为企业领导者要做几件事。首先，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这时，企业领导者必须有非常明确的愿景、使命，从而激发组织成员执行的动力、激情，让他们全力以赴。

接下来就是怎么做，要有执行的方案。分工是什么，任务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步骤是什么，时间线是什么，有哪些资源……这些一定要非常清晰，使得下属在执行的过程中能有计划可依。

第三，是谁来做。人和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选错了执行者，再好的计划也一定会失败。一定要选择最适合承担这个任

务的执行人和他的团队。

第四，就是靠什么来做，要给团队充分的保障。作为组织来讲，最关键的保障就是组织能力。第一要有清晰的分工，第二是在此基础上，能够形成很好的协同。在执行的过程中总是会出现问题，能不能自觉自发地相互协同，而不是勾心斗角，这一点特别重要。形成协同的文化需要组织能力的保障。

有了这四条以后，作为企业领导者来讲，还要有一条——监督和监控。因为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偏差，出现意想不到的事件。因此，企业领导者需要通过反馈机制，在计划和执行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反馈，这对最终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

然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再伟大的决策者也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细节。所以作为一个好的下属，应该是实现上级的意图，

而不仅仅是执行上级的具体命令。如果环境没有变化，下属坚决执行命令，这没有问题。但是命令是企业领导者意图的一个具体化的呈现，可能随着环境发生变化，这时候重要的不是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达成他的意图。

我在我的几本书里都讲过一句话“在企业里，太听话的下属从来不是最好的下属”，原因就是作为下属，不能只是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是推卸责任的执行，是最不负责任的执行。但是，创造性的执行也不能没有边界，它不能变成随心所欲，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不能出现局部最优、全局最差的情况，必须有一种意识——你要对结果负全部的责任。

从领导力来讲，好的团队有两个特点：上级有胸怀，他可以容忍下级不听自己的命令；下级有担当，比如，表面看起来没有执行上级的命令，其实是为了组织更大

的利益。用孙子的话讲，“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这是最高层次的忠诚，但前提是员工得有担当。

如何正确选择企业接班人

选择企业的接班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觉得至少有三条要把握：第一，就是要非常清晰，你要根据什么标准来选择这个人？比如企业未来要进行扩张，那就要根据这个标准，选择一个具有开拓性特质的领导者。如果企业未来可能更多靠的是守成，那么这个人的意志力强大与否，就变成了关键的因素。所以一定要明确选人的标准。

第二，有了标准以后，企业选人要把握住两条，第一要看其已有的业绩和能力。这是候选接班人呈现出来的、你能看得到的东西。但还要更关注其未来的个人潜力。企业选接班人的时候经常会犯一个错误，

就是把他已有的业绩看作是未来的业绩，认为他未来也会有这样的业绩，很自然就会复制，这不可能。其实对于企业领导者来讲，一旦变成接班人以后，潜力因素更关键——这个人有没有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有没有成长的空间更为关键。

第三，明确了选人的标准，同时也选定了企业接班人以后，还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培养计划。我们不要说到时候直接就让他上去任职，其实这是最大的不负责任，一定要有一个一步一步的培养计划，慢慢帮助其成长和适应，这样会更顺利一些。

领导如何把个人意愿变成组织意愿，个人能力变成组织能力

管理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个人的意愿变成组织的意愿，把个人的能力变成组织的能力。

作为企业家需要具备优秀的个人能力，包括很好的知识架构、理念等等，但是这些能力要结合一线的经验，一线的问题，还有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把它萃取出来，形成方法论，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推广、复制，最后形成组织共同的一套打法，这是一个过程。过程当中进一步试错，去动态地调整，越来越优化，形成一个反馈机制。这套流程是使个人能力变成组织能力非常关键的内容，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人意愿怎么变成组织的意愿。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不能一味地从上往下压，那是没用的，要从一线基层的诉求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另外，所有个人意愿的落地，一定要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之上。人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基层一定首先是感性的，所以共情是共识的前提。有了共识，最后才有了共行，它是这样一个逻辑。

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企业面临的挑战有何不同

在初创时期，对任何组织来讲最主要的就是生存，先活下来。所以这时候最关键的是要机动灵活，像游击队一样。组织文化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一定要敢于冒险、试探、创新、试错。还有一个重心就是客户导向，一定要关注客户的需求，这是企业活下来的前提。

快速成长期，企业最关键的是复制能力，因为企业已经找到生存的切入点后，就要复制，迅速扩张，就要标准化，规范化。这时候要开始进行制度建设，包括流程、组织层级一定要建立起来，这样才能支撑企业的迅速扩张。这个过程中，组织文化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结果导向。这时候要有考核，要有绩效。

对于成熟期的企业来讲，最大的挑战

是失去当年的活力，失去当年创业的时候那种激情，失去企业家的精神，很容易陷入僵化、官僚化、行政化，最后陷入平庸化。这是很多组织的宿命。如何保持企业的创新能力就特别重要。

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是不一样的，但是一以贯之的还是组织的使命、愿景、价值观，这从一开始就要很清楚。好的组织的初心从来不会变。

给年轻人的两点人生建议

我想给年轻人的一个建议就是，要做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不要看别人怎么选择，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做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而这里面擅长比喜欢更重要——自己喜欢的东西未必擅长，早晚有一天你会没法儿喜欢了，但擅长的东西早晚会喜欢。找到自己人生的战场，自己擅长、喜欢的打法，这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战略。

第二个建议是，其实一个人的成功是熬出来的。聪明人和有智慧的人不是一回事，有些聪明人为什么往往反而做不了大事？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太多的机会，却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坚持。

曾国藩是比较笨的人，但是他的成就为什么超出很多比他还要聪明的人？他的人生智慧简单地说就是“拙诚”二字。“拙”就是一步步地做，“诚”就是实实在在地去做。结硬寨，打呆仗，最后一步步在动荡的环境中成就了他的事业。

如果你选定了自己的方向，中间会遇到很多挫折，甚至会遇到很多诱惑，坚持自己的方向，保持自己的定力，持续不断地走下去，日拱一卒，功不唐捐。我觉得这是曾国藩人生最核心的一条，他称之为“倔强之气”。因此，耐心有时候真的是非常高贵的战略品质。

侯宏¹³：战略是关于做强的学问

不是财富 500 强，是财富 500 大

战略这个词大家经常看到，但有没有想过，有战略跟没战略的区别是什么？战略的目的是什么？截止 2022 年，中国公司在财富 500 强里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公司。这其中有一些民企，但大部分是国企。从这个数据上来看，中国企业已经做得非常成功了。

财富 500 强的评选标准是按照营业额，实际上应翻译为“财富 500 大”更贴切。但一个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与规模是两回事。就好像人一样，每个人都在成长，可

13. 侯宏：国发院管理学助理教授。

能体重越来越大，个子越来越高，但是你的文化、认知、能力有没有与之同步增长呢？你能够胜任的事情有没有变多呢？你到底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在损毁价值呢？

什么叫创造价值？得有一个参照系。钱如果存放在银行里面，获得的是固定利息；如果拿这个钱去做生意，创造的回报要大于放在银行里面的回报，才能说创造了价值。ROIC (Return of invested capital) 这样的概念就是用来衡量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在过去 30 年，美国的上市公司投资回报率的中位数，最低大约是 6%，最高可以到 17%。但是中国上市公司的该数据最高是 7%，差不多是美国上市公司的最低值。

从这个角度，虽然中国公司在财富 500 强里的数量超过美国公司了，但在价值创造方面的差距还非常明显。

为何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存在差异？

如何理解公司与公司之间价值创造能力的差距？这是企业战略研究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即“有战略”和“没战略”的区别是什么？

至少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行业。不同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或者投资回报差距非常大。比如在美国，烟草行业企业 ROIC 的中位数最高，而电信运营商的最低。第二，即使在同一行业里面，前 20% 的企业与后 20% 的投资回报差距也是巨大的，甚至要超出行业间的差距。

那么，是什么决定一个企业在行业内的相对竞争地位呢？这里面有两个潜在解释。一是选择了不同的细分市场，比如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的零售业务利润率不同；二是在企业个体层面，确确实实一些企业比另一些企业更有能力、更有效率。

大而不强是没有战略的恶果

中国公司大而不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过去很少有战略。在一些人看来，赚到很多钱就是成功，而成功自然有战略。我不认同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说法。对这种认知有一个讽刺性的评论“靠运气挣的钱终究会凭实力亏掉”。过去，中国经济水大鱼大，经济一直往上走，企业跟着水涨也长大了。水大鱼大是好听的说法，说得不好听叫浑水摸鱼，也就是并不一定有一个清晰的战略。插根扁担也开花的时代要战略做什么呢？互联网企业为什么过去增长那么快？因为10年前还没有那么多人用互联网，到处都是增量。但现在有时候有谁没用过互联网呢？所以用户驱动的增长失效了，公司增长也近乎停滞。

相对于以前的高裕度环境，现在企业要在低裕度环境下竞争。这个环境有三个特征。一是虎口拔牙难。竞争白热化，或

者内卷。一个机会有无数人和公司竞争，职场也是市场，很艰难。二是击鼓传花难。告别了用户红利阶段，可能也告别了资本红利阶段。以前投资者只要找到下一轮融资的接盘，就是胜利，但现在二级市场（也就是击鼓传花的终点）这么冷淡，这个游戏玩不下去了。三是打擦边球难。中国的行业管制日趋成熟。以前是先放放，然后再看；现在可能是先管管，然后再松。从创业的角度，很多机遇就没有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战略变得重要起来，我们需要具备战略思维，用战略去配置资源，而不是简单逐利或机会主义。

战略指引企业做强，而做大是做强的结果

如果企业的产品还处于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增量市场很大，是不是就不需要战略了？答案是否定的。下面结合一个案

例理解。

在 1991 年美国现代零售业发展的早期，沃尔玛和凯马特的份额都是 14% 左右，但凯马特的收入主要来自城市市场，而沃尔玛在城市与农村市场的收入大致各占一半。沃尔玛在城市的份额比凯马特低，但是在农村的份额比凯马特高 50%。这个不同导致后来凯马特倒闭，而沃尔玛成长为第一大零售商。

试问如果你是 CEO，先在农村开店还是先在城市开店？一般来说，城市市场大，城市人口密集，购买力高，为什么不在城市开店呢？但战略永远考虑竞争，城市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凯马特在城市市场的份额只有百分之十几，议价权是弱的。而沃尔玛在农村市场的议价权是强的。沃尔玛当年有一个开店秘诀——比如这个县城市场是 200 万人口，沃尔玛抢先进入，开一个 250 万容量的大店。后来者一调研，

说这个市场容量太小，很难容纳新的玩家，如果我们进入，最好的情况是两家都赚不了钱。理性会告诉它，不要去那个市场，再找一个新市场吧。这正中沃尔玛下怀。这样，几乎垄断了农村市场的沃尔玛获得了更优越的发展环境、经营现金流以及利润率，而陷入血战的凯马特几经沉浮，最终现金流断裂宣布了破产。

这个故事表达的是“做强”和“做大”之间的关系。如果只追求规模，而不去考虑竞争优势，结局很有可能像凯马特一样。类似的故事一直上演，“百团大战”里美团的策略，以及共享单车大战里哈啰的策略，与沃尔玛非常类似。可见，我们要从战略角度去判断一个市场的吸引力，而不仅仅考虑市场规模。

并不是说做大不重要，沃尔玛、美团、哈啰都已经做大并在继续做大的征途中。但是，这只是结果，它们都不是通过盲目

追求规模而做大的，而其他一开始就把规模作为最高目标的同行都没有走到现在。

战略是关于做强的学问，不能转化为壁垒的规模难以持续，而做强是持续做大的必然路径。换句话说，不是所有规模都具有同样价值，盲目追求规模可能是陷阱。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案例谈的都是低线市场跟高线市场的选择，但它的启示超越了地域市场细分这个维度。你的业务可能考虑不同产品线、不同客户市场，但背后的战略思维是通用的。

有人会说：一些企业，比如京东方，确实是通过坚定不移地扩大规模实现胜利的，规模效应也确实是创造价值的重要途径，追求规模有什么错呢？我没有详细研究京东方的案例，但我可以澄清：规模很重要，但规模与规模并不是等价的。规模并非均匀分布的，企业需要在战略思维的

指引下聪明地追求规模。沃尔玛并不是不追求规模，而是选择优先在农村市场追求规模，这背后就是战略智慧。

股票市场与 GDP 的关系

2022 年年底，一个投资者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表现做出三点反思：一是我们的企业普遍没有护城河、没有全球竞争能力、没有特别的技术。第二，我们的监管环境更加波动。第三，GDP 增长与企业的业绩以及股票的表现没有多大关系。前两点佐证了我前面的观点。这里要展开的是第三点。

GDP 增长和企业绩效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去年看到上述第三点的第一反应是：GDP 可以受益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这是一个普遍过程，最终不会成为竞争优势和优胜绩效的来源，因为你的对手也同样提高了。比如，所有公司拥抱数字化

将使得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当且仅当数字化由独特的公司战略驱动时，才能创造竞争优势。那种跟风、对标、赶时髦的数字化，充其量只能带来竞争均势，让企业获得行业平均利润，而非投资者所期待的超额利润，也就不能带来股价上涨。

可见，GDP 和企业绩效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不可比。一方面，GDP 是总量概念，而绩效或者竞争优势是个体概念。另一方面，GDP 是对过去一年的统计，而股价更多体现对未来的预期。当我们说一个企业有好战略，就是对绩效或竞争优势的预期，很可能影响股价。反之，经济增长会带来更多的创业机会，但由此成长起来的公司是否具有投资价值，那是另一回事。

04.

承泽精选

编者按：

本期“承泽精选”栏目精选了国发院教授近期的两篇重要文章。

第一篇是北大国发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黄卓与合作者发表在《科技日报》上的文章，论述了以人工智能推动我国生产力整体跃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路径，并对于如何疏通当前AI产业发展的堵点提出了多方面建议措施。



第二篇文章，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李力行从城市化的界定讲起，梳理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与未来方向。

黄卓、周鼎：加快发展人工智能 实现生产力跃升

李力行：中国的城市化还能走多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黄卓、周鼎¹⁴：加快发展人工智能 实现生产力跃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发展，以AI推动生产力整体跃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路径越发明晰。疏通当前AI产业发展存在的堵点，对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4. 黄卓：北大国发院副院长、经济学副教授、发树学者、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周鼎：北大长沙计算与数字经济研究院智库中心主任助理。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础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AI 对上述各个维度均存在积极推动作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首先，在技术突破方面，通过大数据、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神经网络等技术手段，AI 已发展至由数十亿到数千亿个参数组成的大模型阶段，使机器具备了模仿人类思维的能力，驱动机器不仅对重复性劳动而且对创新性劳动实现了逐步替代，带来了技术的革命性突破。

其次，在要素配置方面，AI 作为新生产工具正融入社会生产各环节，它以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算力作为新基础能源，

通过人机协同新模式，以“劳动者高技能化、劳动资料智能化、劳动对象多形态化”促进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推动了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

最后，在产业升级方面，AI 通过生产要素的组合优化与整体跃升，延展了传统生产边界、开拓了新型产业空间，培育了基于 AI 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了产业跨界融合与深度转型升级，并由此加快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大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 AI 产业发展进入“深水区”，AI 产业发展中的堵点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部分 AI 先发技术仍处于追跑阶段。当前我国 AI 大模型在整体架构、模型规模、数据吞吐、训练算法等核心技术方面相较于国际最高水平仍有距离。二是对 AI 应用

研发的算力供给有所不足。算力是 AI 三个核心要素之一，我国算力存在“智算中心少、大型数据中心少、国产自主高性能算力硬件设备少”的情况。三是对 AI 产业发展的要素支撑相对有限。当前我国在 AI 领军人才数量上仅占全球 14%，行业投资数量和投资额相对较低。

多措并举疏通产业堵点

针对上述 AI 产业堵点，应从研发体系、技术攻关、应用场景、要素保障等方面发力，使 AI 更好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是构建 AI 产业研发体系，蓄足新质生产力“源头活水”。要形成由“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级创新平台—科技领军企业—新型研发机构”构成的“顶天立地”研发体系。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面向 AI 的基础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持续深耕。国家级创新平台重点突破 AI 大模型的架构、

规模、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科技领军企业整合集聚创新资源，开展 AI 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新型研发机构发挥体制机制创新优势，结合 AI 产业需求开展目标导向的有组织科研，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四者之间基于新型举国体制，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彼此渗透，蓄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

二是实现 AI 技术突破，催生新质生产力核心动能。一方面，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对于 AI 大模型底座等技术主战场以及算力软硬件等核心支撑技术的持续投入，对算力硬件设备领域的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加强对 CHIPLET、存算一体等关键技术的专项攻关。另一方面，应结合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统筹布局超算中心、智算中心、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对百万核心以上规模算力资源调度能力的技术攻关，形成高效率、

低成本、规模化的 AI 公共服务支撑平台，催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能。

三是打造 AI 产业应用场景，提供新质生产力物质资料。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在通用 AI 领域尚未形成显著优势，而基于国内广阔市场和海量数据，可优先发力专用 AI，形成“AI+ 行业应用”的垂直效益。深度挖掘、积极打造可应用新一代 AI 技术的各类场景，进一步在金融、商务、政务、教育、文旅等不同行业领域拓展场景应用，形成 AI 多领域跨界应用生态，推动既有行业提质降本增效和新经济增长点探索培育，提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物质资料。

四是强化 AI 产业支撑合力，巩固新质生产力要素保障。应推动研究制定“AI+”行动方案或相应政策，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同开展 AI 人才培养项目，健全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国有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作用，鼓励政府产投基金为

AI 企业提供多元股权融资，完善科技保险风险共担机制。

总之，要通过疏通 AI 产业堵点，以新一代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实现经济社会各领域各环节智能化转型升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点燃新引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李力行¹⁵：中国的城市化还能走多远？

在北大国发院 MBA 的课程中，有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模块，主要讲解经济学原理和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也非常注重运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我认为对商学院的学生而言，这是非常好的学术训练。今天我们讨论“中国城市化还能走多远”这个话题，也是想借此话题，向大家展示如何运用经济学原理理解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

什么是城市化？

城市化这个话题大家都不陌生，它主

15. 李力行：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

要包含哪些要素？

1、空间的城市化

观察和衡量一个城市的发达程度，夜间灯光亮度图是一个公认的参考指标，即夜晚某地地面灯光亮度如何。

以京津冀地区为例，1992 年和 2009 年的情况相比，灯光亮度覆盖面积大幅增加，特别是北京和天津灯光亮度覆盖面积扩张非常明显。“北三县地区”位于北京和天津之间，因其房价相对便宜而成为北京人的后花园，这片区域的卫星灯光覆盖面积扩展得也非常明显，河北廊坊主城区的情况也是如此。这说明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的面积会大幅扩展，夜间灯光覆盖程度会扩展到更多区域。

土地从农业利用转变为城市利用，也是一种衡量城市化变迁的指标。以美国的亚历山大小镇为例，在 1950 年到 2010

年的 60 年间，小镇周边一块块巨型农田逐渐变为城市。迪拜号称是“沙漠上长出的城市”，其特点是背靠沙漠，面朝大海，可利用的土地资源非常有限，于是在发展基础设施的同时，迪拜就向海洋扩展，建立了棕榈岛、世界地图岛这样一些地标性建筑。因此，城市化也意味着人们采用了更多的土地利用方式。

芝加哥是美国第三大城市，有很多高楼大厦。从城市规划图可以看出，芝加哥目前已经是高密度城市，并且还有很多规划等待建设。东京也是如此，以高楼大厦林立而闻名。在东京一些高楼大厦的顶楼，挖掘机正在工作，继续给高楼大厦增高，因为东京地价寸土寸金，要挖掘更多空间的使用潜力。这些在摩天大楼顶端建造的楼层，价格非常昂贵，因此值得花费大力气去增高。由此看出，城市化也意味着城市变高，不仅是横向扩张，也包括纵向扩展。

2、人口的城市化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曾有大量人口从中西部地区移到沿海。巴西也是如此，大量人口聚集到东南部里约热内卢附近。因此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口流动。大家都知道，农村的生活相对悠闲，人口密度低，人均住宅也比较大；大城市的生活，比如香港，很多人都住在密密匝匝几十层甚至上百层的高楼中，每一户都非常拥挤狭窄，生活状态也会比较压抑。所以，城市化也意味着人们的居住空间从宽松变狭窄，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紧张，甚至是压抑。

城市化也意味着人们通勤方式的变化。比如在北京的西二旗地铁站，上班族在高峰时段经常要排队很久才能上车。东京的地铁站，需要由专门的工作人员用力推着，才能把人们塞进车厢。这说明城市化也意味着拥挤。

3、交通的城市化

交通的城市化意味着大规模的人口集聚。

北京杜家坎收费站是京港澳高速公路的起点。在春运、五一、十一期间，经常会聚集大量等待出城游玩的车辆。火车站也是如此，每逢假期，拥挤的场面随处可见。因此，城市化也意味着人们交通方式的变化，逢年过节就会出现大规模人口迁徙。

通过上述举例，相信大家对城市化已经有了直观地了解。

如何界定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意味着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转移的过程中，整个社会需要进行变革来适应人口转移带来的生产、消费和居住方式的变更。因为城市化，土地利用可能变得更加密集，基础设施数量猛增，还会

伴随巨量的移民潮。

生活方式方面，人们的居住空间和工作类型都发生变化，从农业生产变为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就业的变动，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也要从农业社会的公共服务转型到为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与城市生活相配套的公共服务职能。

城市化还有很多的维度和表述方式，但总要确定一个城市化的标准，目前来看比较统一的标准是核定居住在城市区域的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所以城市化本质上是一个比例，分子是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数，分母是当地的总人口数。

这一定义又涉及两个关键点，即如何界定城市人口和城市区域：

第一，如何界定城市的人口？

大量流动人口、没有获得当地户籍的

人口，这部分人群算不算居住人口？

比如广州作为大都会城市，约有 837 万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中甚至还包含大量的外国人。是否将这些流动人口算作居住人口，对城市化率的计算结果影响巨大。江浙沪地区的宁波同样如此，常住人口数量已经大大超过户籍人口数量，约有 200 多万人常住宁波但没有获得宁波户籍。根据目前的定义，如果一个人在某地的年居住时间不满 6 个月，就不能算居住在该城市。然而，如果一个人居住时间不满 6 个月，但拥有户籍，这样能否算作居住在该城市？

不难看出，在城市化定义中，关于分子部分“居住在城市”一词的解释，需要区分流动人口、常住人口、户籍与非户籍人口等关键的概念。这些概念与城市化的一些制度政策紧密相关。

2023年9月15日，苏州市对其行政区划代码进行了调整，把开发区从镇中心区升级为主城区，代码从121变为111。经过调整，苏州市的常住人口一跃达到500万，成功跻身特大城市行列。只是一个行政区划代码的变化，就使得苏州常住人口数量跨上一个台阶，助力一个城市跻身特大城市之列。

由此可见，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指标多么重要。

第二，如何界定城市的区域？

关于城市区域的界定，按照现在比较流行的“颗粒度”这个词，定义城市区域的颗粒度通常是在社区和村庄层面。以前是按照人口密度来区分城市和农村，比如曾经使用过的一项标准是，如果每平方公里居住的人口超过1500人，就可以被认定为城市型社区。后来增加了新标准，比

如一个社区有没有成为建成区，有没有基础设施连接，总人口规模以及非农就业比重等。

从行政角度看，北京市全市都是城市。但如果从统计的角度细细看，北京哪些区域是城市，属于社区或村庄？哪些区域并不是城市，还属于行政村？这需要根据建成区有没有基础设施等标准来判断。北京有很多村庄和社区已经成型，但周围还缺乏成体系的基础设施，需要从村庄和社区的层面来进一步界定，并不是行政区划上属于北京市管辖区的地方都是“市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划分方式是按照总人口以及非农就业比重。2015年，山东省推出新型城镇化标准，将人口规模达到3000人以上，非农就业比重超过70%的农村新型社区也纳入城镇化的统计和管理。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按照上述划分标准，为了让山东省的城市化率达标，

出现了在当时引发高度关注的大规模的“撤村并居”，让农民“上楼”。有人以为这是地方政府一味追求政绩的行为，其实地方政府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满足城镇化的统计标准。

我国城市化的历程

结合 1953、1964、1980、1990、2000、2010 和 2020 年七次人口普查统计得到的中国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城市人口的发展趋势。

从数据上，我国城市化率从 1952 年的 13.26% 一直提升到 2020 年的 63.89%。

城市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1964-1980 年，我国城市化 16 年间只提升了两个百分点；1980-1990 年，城市化率 10 年间就增加 6 个百分点，1990-2000 年间又增加 10 个百分点，2000-2010 年间增

加 13 个百分点，2010-2020 年间增加了 14 个百分点。

2000 年之前，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都呈现增长趋势；2000 年之后，随着中国总人口增速下降，甚至现在出现人口负增长，城市化率的提升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

中国的城市化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我们实施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无法提供太多就业，这意味着城市无法吸纳特别多的就业人口，大量人口需要留在农村。城市里重工业主要生产机械设备，不生产消费品。在此背景下，我们通过粮票的方式保证粮食供应，同时为了避免给城市带

来更多压力，也实施了人口流动的限制政策。农村人口不能随便进入城市找工作，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因此，改革开放之前的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在1980-1990年间，我国城市化迎来新一轮发展。初期的政策聚焦在小城镇发展，而不是大城市发展。鼓励小城镇的同时，限制大城市集聚，当时实施的一种城市化政策叫“县改市”，就是让一部分县变成县级市。因此在1980-1990年代的十多年间，大量的小城镇和小型县级城发展起来，成为这一阶段城市化的一大特点。

大家都有户口簿，每一本户口簿的户口页上都会有一项标注“农业家庭”或“城市家庭”，这应该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在小城镇发展阶段，甚至推出过“蓝印户口”，算是介于农业户口和城市户口之间的一种过渡。在当时，个人花一些钱是可

以拿到代表小城镇身份的“蓝印户口”。从这个角度看，严格的户籍制度也是早些年我国城市化进度缓慢的一个原因。

近 20 年中国城市化的变革

总体看，近 20 年中国城市化的变革可以概括为“一高一低”。

“一高”指的是土地城市化速度高于人口城市化速度。

人口城市化指的是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城市居住的人口比重提升。因此人口城市化着重讨论的是有多少人居住在城市。在这一定义中，框定城市建成区的面积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实际情况是，在近 20 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土地城市建成区扩张的速度特别快，超过了人口扩张的速度，这就被称为土地城市化。简单说，土地城市化指的是城市土地面积大幅扩张

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主要源于土地财政政策。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拍卖，把农村用地变为城市用地，再把它拍卖给房地产公司建造住宅。还有一种方式是土地出让给工厂，建造制造业、服务业、仓储等用于公共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土地从农业用途变为城市工业、商业、交通、基础设施等新用途。因为能够获得不菲的土地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有很强烈的意愿和动机来推进土地拍卖。房地产企业通过拿地盖楼卖房也能分一杯羹。

然而，土地城市化扩张过快造成了大量空置、闲置房。比如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一度被称为“鬼城”，就是因为土地城市化扩张过快，但人口增长跟不上，造成大面积的房屋没有人居住，夜晚整个城市鲜见灯光，一片漆黑。

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融资的一种方式。当我们谈到城市化财政时，不得不简单回顾中国的公共财政体制。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实施了财政分权，赋予地方发展经济的很强的动机，也造成了不同地域间激烈的竞争局面。大家你追我赶，想尽各种办法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获得税收。从 1994 年开始，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中央从财政收入中截留了很大一部分，地方政府普遍缺钱。地方政府为增加收入费尽心思，既然预算内的法子行不通，那只能从预算外的方式着手，影子财政等事物也随之出现。除了通过税收获得财政收入之外，地方政府还诉诸土地财政，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来融资。

土地财政就是在上述制度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般而言，政府财政预算主要用于公务与工资、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土

地财政这一手段成为独具特色的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手段，就是不靠中央政府拨钱，不靠预算内财政收入，而是依靠地方政府预算之外的财政渠道，特别是卖地这一手段来融资。这也能解释地方政府对于从农民手中拿地这件事特别积极的原因，背后是土地财政。有些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几乎占其公共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土地财政也是导致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原因之一。

“一低”指的是中国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比较低。

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工”。这里的“农民工”是个广义概念，指的是从本地到外地去工作，但没有获得当地户籍的人口。根据 2020 年的人口普查，这一群体的数量高达 2.86 亿。有的农民工是拖家带口进城，更多的农民工可能没有办法把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带在身边，留守

儿童问题也由此产生。当大城市政策收紧时，这些农民工可能要被迫离开城市。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人口净流入省份主要位于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等；人口净流出省份主要是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比如黑龙江、吉林的人口流出情况特别严重。

流进城市的人口大部分都没有获得当地户籍。为什么获得当地户籍如此困难？首先是地方政府并不愿意接纳所有的流入人口。因为一旦获得户籍，地方政府需要提供包括子女教育、就业保障、社会保险、医疗甚至保障性住房在内的公共服务，这些全部需要地方政府自掏腰包。根据 2010 年的一项测算数据，每接纳一个移民在当地落户，地方政府可能需要为其花费 10 万到 20 万的公共财政支出。因此，地方政府不愿意为所有流动人口安家落户。然而对

流动人口而言，能否落户非常重要，事关子女能否享受当地的教育资源和本土高考权利等。正因为地方政府有顾虑，在给予流动人口户籍这一问题上积极性不高，导致很多地区的户籍人口数量低于常住人口数量。

如果把获得当地户籍和没有获得当地户籍的流动人口分开计算，我们的城市化率就存在“一高”和“一低”两组数据。根据 2020 年的统计，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 45%，比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要低 18 个百分点。

这些没有获得城市户籍的人口，或者是获得城市户籍、但仍保留着原来农村生活方式的人，他们大多需要在城市寻找一些比较便宜的住所。久而久之，城市中能够提供低廉住房的城中村成为这部分人的理想选择。比如在深圳有很多城中村，因为这里地价寸土寸金，为了最大化利用空

间，城中村的房屋盖得又高又密，有些房屋甚至有 10 层高。楼间距也特别窄，被称为“握手楼”，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根本开不进来。

城中村与其所在城市的繁华形成鲜明对比，但其又的确是城市的一部分。最近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深圳有 40% 的建筑是城中村，住有 60% 的常住人口。在城中村居住的感觉毫无疑问是非常压抑的。北京也有城中村，过去 5 年的时间里，北京大学周边就有 5 个城中村已经消失。这意味着可以用于低廉租住房的区域在减少，生活成本和租房成本相应上升。

2017 年，北京大兴的城中村发生一场大火灾。此后，北京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要疏解所谓的“低端人口”。

“低端人口”这个词非常刺耳，在当时引发了负面舆情。这些年来，北京市疏解的步伐并没有停止，清理整治的力度持续加

大。除了城中村，一些小产权房也被纳入清理的范围。小产权房是城市中非常典型的居住模式，跟城中村很像，只不过小产权房的外表相对光鲜亮丽。除了“城中村”和“小产权房”，还有一种叫“棚户区”。

“城中村”“小产权房”“棚户区”这三种非正规的住宅各有各的成因和特点，不仅是中国，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其中的居民大多还没有在这个城市安定的想法或条件。这部分人的储蓄率很高，甚至可以和农村居民的储蓄率相比。因此，在总人口中占比不低的这一群体，为了子女和自己的养老问题必须拼命挣钱攒钱，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整个中国的消费。

小产权房广泛存在于城市周边，因为大多建在农村土地上，价格便宜，不足之处是不能给购房人提供合法的房产证。为什么会出现小产权房？主要是因为中国独有的产权制度。农村和城市的产权制度不

同，土地和房屋的产权都各有特点。农村土地自有一套体系，如果没有经过政府的征地出让和开发商的销售，建在农村土地上的房屋无法变成合法的商品房，也不能对外销售。可以看出，国家对农村土地的占有、使用和销售都预设了很多限制。

综合来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已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城市化速度比较慢，城市化水平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较低。背后的制度原因是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户籍制度，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继续实施的小城镇优先发展战略，限制了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城市化速度突飞猛进，尤其是土地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速，面积扩张迅猛，大幅超过了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

在这一进程中，户籍人口的城市化速度相对较慢，特别是居住在“城中村”“小产权房”“棚户区”中的城市居民，虽然身在城市，实际上处于低度城市化的状态，要么无户籍，要么无社保，子女可能是留守儿童。这部分人虽然身在城市，仍保留着农村的生活方式，即储蓄率高，消费率低。

中国城市化的未来

要讨论中国的城市化还能走多远，离不开对过去的分析。过去土地城市化速度较快，人口城市化速度较慢。在城市化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消费水平跟不上。

要想维持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需要做一些矫正。比如生活在城中村的这部分人，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保障和公共服务，在此基础上挖掘这部分人的消费潜力。城市化的进程不能只看城市化率，更要关注城市发展的潜力、有多少人还生活在低度城

市化的状态、多少人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我们城市化的发展还面临很多局限，想要弄清楚这些局限，还需要了解经济发展规律。我推荐几本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城市的胜利》《城乡中国》。通过这些书，我们可以了解城市集聚的经济规律，了解城市化水平与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对比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可能仅相当于美国 1950 年左右、日本 1965 年左右的水平。当年的美国和日本，达到 60% 城市化率之后，仍有很大的城市化发展空间。因此，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城市中仍存在大量的低度城市化人口，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在未来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通过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想要了解城市化就需要在了解中国一系列制度的基础上，对其背后的制度因素加以总结。国

发院 BiMBA 商学院有中国经济的课程，有助于大家对制度的认知，包括财政制度、户籍制度、产权制度、城乡分割的行政区划、官员选拔制度等。

想要继续挖掘中国城市化的潜力，我们需要学习经济理论、制度基础、政策约束等多方面的知识。我强烈建议大家从实际观察入手，继而提炼出值得研究的问题。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论也贯穿在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中国经济发展》这门课程中。这也是国发院的工商管理教学的一大特点：从中国制度背景政策分析看中国经济发展。在系统学习之后，“中国城市化还能走多远？”相信大家会有自己的答案，我们可以找机会再做更深入的交流。

版权

制作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制作部门：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编选委员会

黄益平：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黄 卓：北大国发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王贤青：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

白 尧：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内容主管

顾问委员会（按姓氏拼音）

符 永 康（中国新闻社编委、中新经纬总编辑）

高 岚（联想集团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北大国发院CHO100理事）

何 刚（《财经》杂志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

刘 二 海（愉悦资本创始及执行合伙人、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刘 娟（新华网副总编辑）

刘 军（前美菜网CHO，北大国发院CHO100理事长）

吕 守 升（高潜咨询公司董事长、北大国发院CHO100理事）

马 洪 涛（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乔 顺 昌（茂天（北京）投资公司总裁、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唐 建 伟（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副总经理、首席研究员、《新金融》期刊主编）

王 海 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北大国发院双学位校友）

文 钊（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

乌兰图雅（玲珑格致国际公关咨询CEO、北大国发院MBA校友）

武 雪 松（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许 芳（深圳市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理事长、北大国发院CHO100联席理事长）

余 兰（20年知名互联网公司营销高管、AI应用创业阶段、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张 继 伟（财新网总编辑、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赵 雪 源（北大国发院MBA校友）

周 瑛 锋（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朱 晓 楠（GC首席人力官及投资MD、北大国发院CHO100成员）

官方微信公众号



北大国发院

*【特别声明】本资料为北大国发院编选制作的内部学习资料，仅供参考，严禁外传。